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

2017年第1期 总第19期



- 林奇教授访谈录
- 陈子越：南海仲裁案的发生机理、内外影响与对策建议
- 崔屹鸣：麦金德与斯皮克曼地理政治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 刘 畅：与美约会——我的俄罗斯文化情缘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冯弘雷

沟通的渠道

交流的平台

启发智慧

砥砺思想

分享知识

奉献感悟

吴文

慢慢走，欣赏啊

陈子越

上海的春天总是突然来临，还没来得及适应乍暖的空气，外面早已变得十分温暖，真是适合郊游踏青的好天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早在几千年前的《论语》中，孔子便和弟子探讨了这样朴素的人生志趣。

可能，在生活中，这样简单的美好是太多人所向往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面对生活的压力，我们更多时候选择的是行色匆匆，选择的是为生计而奔波，忽视了身边最朴素的那些美好。

一直很喜欢朱光潜先生在文章中引述的那个小故事，他说，“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的急驰而过，无暇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是我想，我们的生活中都需要慢慢走，欣赏啊。

上海的春天虽然短暂，但是煦暖阳光下的草长莺飞总会惹人流连忘返。试着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试着舒缓自己心中的压力，试着让自己从电脑和手机的束缚中挣脱开来，你会发现，生活远远不止是生存，生活还需要有更多人生的志趣，即使是最朴素的。

同样，阅读也是一种让人慢下来的艺术。虽然这期的《闻道》姗姗来迟，但我希望能够成为生活里的一种点缀。在未来的日子里，《闻道》将不仅紧扣时事热点，也将会关注生活里的点滴，将阅读的美好融入你我的生活之中。

慢慢走，欣赏啊，莫负这大好春光。



2017年第1期
总第19期

主 编：
陈子越

执行主编：
陈子越

副主编：
刘一鸣 孙 莹
夏真真 张 莹

编 辑：
(按拼音字母为序)
陈 征 陈子越 康 恺
连鹏飞 刘一鸣 陆依宁
沈钦韩 孙 莹 夏真真
岳叶帆 张 颂 张 莹
赵中野 周婷婷

封面题字：
冯绍雷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目 录

卷首语

慢慢走，欣赏啊 陈子越

学人访谈

林奇教授访谈录
.....(01)

地缘政治与南海局势

麦金德与斯皮克曼地理政治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 崔屹鸣 (11)
作为“边缘地带”的南海——南海仲裁案的发生机理、
内外影响与对策建议
..... 陈子越 (17)

史海沉浮

从清政府对私盐的打击与私盐抗争看清代统治的衰
弱..... 朱信荣 (29)

极地之光

Three Scenarios for Development of the High North till
2030: Implications for Fisheries
..... 史书怡等 (37)

百花齐放

赴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短期交流感悟.....张莹(47)
与美约会——我的俄罗斯文化情缘.....刘畅(51)
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文森特的跨国道义价值观.....李享(59)

国关要闻

.....(64)

《闻道》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闻道》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本刊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座414室

邮编:200062

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网站:<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学人访谈

林奇教授访谈录

人物简介



Allen Lynch: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荣誉研究员，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艾伯特加勒廷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美俄关系，中俄关系。曾在“Foreign Affairs”、“National Interests”等期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闻道》：最近，关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新闻层出不穷，您觉得目前俄罗斯应该做些什么，采取什么方法来改善跟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呢？

林奇教授：我认为，当前，俄罗斯很难找到可行的方法，也很难采取实际的行动，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本质。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包括了经济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军事上的以及政治上的各种因素。

客观来讲，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长期对抗，美国对这一地区严阵以待，花费了很多精力。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去学习俄罗斯的文化跟语言。但是，苏联解体之后，两者之间国家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俄罗斯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强国，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权力的不均衡。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冲突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点不同。美国是超级大国，其影响范围是全球范围的。俄罗斯是个地区性大国，跟中国一样，俄罗斯想成为被关注的中心点，但其实它并不是。

第二，利益点不同。美国的利益关注点是全球性的，俄罗斯很多时候是区域性的，当然，区域利益也很重要。俄罗斯是局限于它的国土所处的区域周围的。俄罗斯在它的历史领土范围的周围有其自身特殊的经济、文化、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 20 年来的政策一直在平衡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他们发现美国并不允许他们同时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保持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和关系，同时在后苏联地区发挥主导性作用。乌克兰危机就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价值观念冲突。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自由、民主、人权、国家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后现代的，这与普京总统所建设的传统类型的政府合法性的相冲突。虽然苏联在 20 世纪受到了巨创，他们建立了很多宏伟的教堂，形成了独特而又深厚的文化，成立了辉煌的帝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他们充满了自豪感。



美国与俄罗斯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然而，美国与俄罗斯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普京，曾经至少两次尝试着去理解西方世界的逻辑，尤其是在 2001 年的 9-11 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如伊拉克问题、军事问题、NATO 东扩等等，他还是没能理解华盛顿的政策逻辑。与之对应的是，普京对俄罗斯的合法性的理解更加民族主义，也充满了爱国主义。这一传统的理解与西方国家的想法正相反。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偏好，而是俄罗斯向欧洲靠拢失败所导致的结果。当时的俄罗斯认为，与西方国家接近是首要任务，就如 2001 年普京在德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说的那样，“俄罗斯不只是具有欧洲文化的国家，而是西方欧洲国家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计划失败了，俄罗斯所作的这一切无法得到美国的认同”。

主观上讲，这也与美国人的观念有关系。美国很多人认为，普京不好，俄罗斯是个问题。冷战以来，反俄罗斯的情绪就深深的根植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和政治制度里。而且，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强大应该无所不在。就像特朗普竞选时所说的口号“*We shoul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因此，我认为相比冷战时期，俄罗斯对美国来说，没有苏联那么重要。

《闻道》：您的意思是相比于冷战的时候，现在美俄关系之间反而更可能出现障碍和威胁是吗？



林奇教授：冷战期间也有很多的障碍，最危险的时候发生过古巴导弹危机，让两方都感到十分恐慌，当时，也存在对核战争的恐慌，于是双方签订了很多反导协定，来预防核战争的发生。冷战期间，美国对俄罗斯非常关注，非常重视这一地区。可是，现在的美国将俄罗斯的战略地位放在跟苏联不同的水平，美国不理解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在意它的一举一动。而且，其实美国国内反普京的情绪还是挺强烈的。

《闻道》：这学期我们有一门课叫“Globalization”，我阅读了很多关于全球化的书，我看到，其中有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全球化近似等同于美国化，中国当前也在努力提高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现在我们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您能谈谈您眼中的中国吗？您觉得现在的中国跟您第一次来的时候相比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变化呢？您觉得中国在不远的未来能够变得像美国那样有影响力吗，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根据您的观察和理解，您觉得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能够取得理想的结果吗？

林奇教授：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 2003 年，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我又去过很多其他的城市像杭州、北京、南京、哈尔滨等。你刚刚提到了全球化这个概念，从一个方面来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是一个主导性的市场主体，“迪士尼现象”屡见不鲜，所以说很多人会将全球化与美国市场的拓展联系起来。可是，从更广的方面来看，全球化更多指的是市场的拓展。美国现在可以不仅仅局限于雇佣美国员工了，它还可以雇中国的、墨西哥的。我认为这些年里中国的整个情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举一个例子，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际上几乎没人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可是，现在

美国根本不敢轻易派军舰去台湾海峡。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在国际上，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进行对比，据我之见，我曾经研究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文化革命，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当时人口的 80%至 90%，现在城镇人口大幅度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城市与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转变速度是美国当时的变化速度的五倍。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怎样整合和团结各民族？怎样处理腐败问题？经济改革应当以哪种方式进行？怎样处理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关系？中国的政府的体制该怎样改进以跟上时代的变化？而且，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占有明显优势了，很多企业转移到了越南，而在以前的日子里，中国在两年内生产的水泥都可以超过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的产量。所以，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政府有能力应付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吗？

中国是区域性大国，专注于国内的发展；美国是全球性大国，它的影响是全世界的。美国对中国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充满忧虑的。所以目前来看，能够实现双赢的局面是最好的。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获得了相对于邻国来说更多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邻国会持续相信中国吗？



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邻国会持续相信中国吗？

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邻国的不信任，甚至这些邻国将会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中国的强大也让美国感到担忧，中国的邻国们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向美国靠拢。双赢的结果是好的，但是并不是每个政策，每次合作都能实现双赢。如果中国的措施不能实现双赢，那么周边国家怎么想？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会不会寻求向美国靠拢？中国的南海地区的领土争端态势会不会再度紧张？如何安抚周边国家的敌视情绪，如何让自己被接受，这应该成为中国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即使美国不同意，中国的影响力也极大

的提升了，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这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中国首先应思考的问题时是怎样安抚邻国的不安，这是一带一路能够达到理想的结果的前提。

《闻道》：俄罗斯近年来关注点向东方转移，转向中国。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土耳其、克里米亚等地区的举动，中国的领导人都有什么反应呢？中国一方面与俄罗斯保持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避免卷入俄罗斯与他国的冲突中，您如何看待这一行为呢？

林奇教授：我认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很成功。中国与俄罗斯现在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自从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以来，中俄经贸关系蓬勃发展；军事上，不仅仅将油气资源卖给中国，俄罗斯向中国贩卖重要的武器装备，这对中国的军事防御十分有力，这对解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地解决都是有帮助的。而且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没有领土纷争，领土争端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解决清楚。

我认为，莫斯科与北京的决策者们是非常实际的，他们对两者未来之间的关系也有着非常现实的理解。或许普京会说，我们近来的关注点向亚洲转移，跟中国关系拉近，这是因为欧洲国家和美国一直在制裁我们。要知道，普京他首先是个能源专家，他心里清楚，不管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多重要，它也不能代替与欧洲的关系，尤其是在油气资源贸易这方面。一直到近几十年来，俄国对欧洲的油气出口，一直都是俄罗斯出口的主要部分。欧洲支付给俄罗斯的钱占了俄罗斯国家收入的20%甚至更多，这些钱超过一半都来自于油气资源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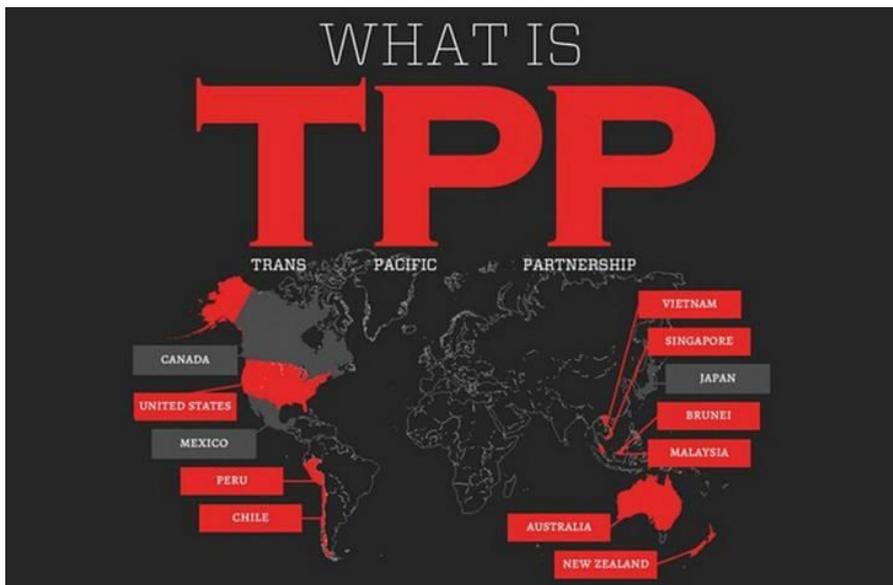
俄国对欧洲的油气出口，一直都是俄罗斯出口的主要部分

如果将这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之间的贸易

量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进行对比，那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他们之间的比率大约是 10:1，如果你再去中国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量与中俄贸易量进行对比，那么可以发现这个比率大约是 15:1。因此两者之间的油气资源合约并不能改变这种相互依赖的差距。

因此，中国与俄罗斯都明白他们之间的经贸往来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有共同利益。他们可以相互合作共同限制美国的权力，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促进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变革。而且他们也都清楚现在跟 20 世纪 50 年代那个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了，两者之间关系也不同于中国-苏联的关系。如果世界经济体制再次崩溃了，正如 1929 年那样又一次陷入混乱秩序，中国与俄罗斯依旧能够保证自己的能源供应，保护经济发展的基础。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只是限制了美国的高新技术进入俄罗斯，但是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向欧洲的能源供应。

《闻道》：让我们再次将讨论点转移到美国。TPP 能否被通过这是近来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您如何看待 TPP 的未来？如果没有通过，那么你觉得这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事件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 GDP 呢？



随着美国宣布退出 TPP，TPP 的前景扑朔迷离……

林奇教授：这个问题提及了很多关于美国经济的分析，这其实不属于我的

研究领域，我将尽可能地把我所了解的信息说出来。首先，我认为美国不太可能会通过这一提案，尤其是在这一大选之年。TPP 实际上可被看作是未来另一个版本的全球化。它能够减少贸易壁垒，削减关税，增加各方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对美国整体来讲，TPP 所能带来的收益是可见的，人们将得到更低廉的进口商品，也会使得出口更加多样化。对大多数行业来说，TPP 所能带来的收益是微小的，而且收益也是不确定的。TPP 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也非常具体。更多的工厂将会被关闭，失业率将会增加，在这个协议里，我们说不清谁是获益者，但是谁的利益会受损这一点却很明了。正在政治上来看将是个非常敏感又脆弱的话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并且参与了对这一提案的协商。外交是外交，政治是政治，她也不想人们在人们关注的话题上失去选票。

第二，美国与大多数太平洋地区国家和地区间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我能不确定具体的数据，但是我们要了解，日本、韩国、台湾、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很多年以前就可以自由地进入美国的市场了。中国在 1979 年也得到了最惠国贸易待遇。我猜测，TPP 实际对美国的经济冲击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对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对美国经济的融入比较多。TPP 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可是这一影响更多的是在政治上的象征作用，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具有决定作用的显著影响。

闻道：您明年还会来我们学院教授课程吗？如果会，那您会教授哪些方面的课程呢？

林奇教授：这个问题我目前还不确定，或许明年会来，或许是后年。下次来的话，我计划教授一些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与现状的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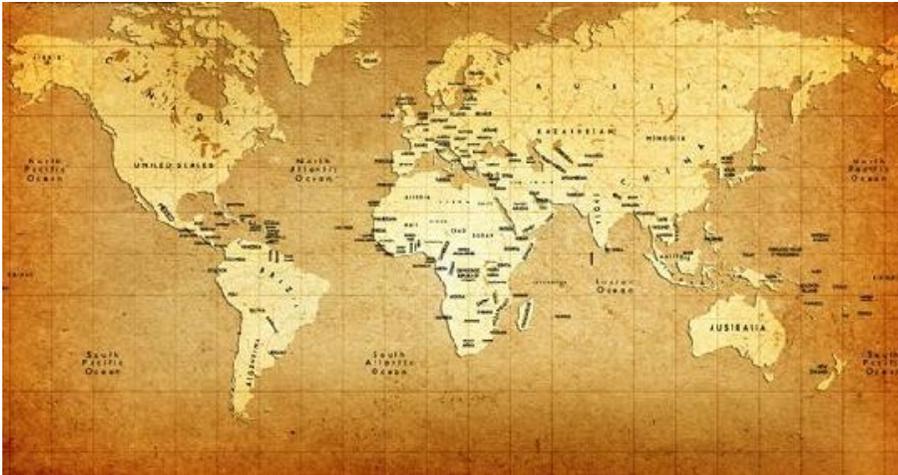
林奇教授曾多次前来我校开设课程、举办讲座

（采访：张莹、Maria

编辑：张莹、陈子越

责任编辑：张莹、陈子越、陆依宁）

地缘政治与南海局势



【编者按】“地缘政治”源起于政治地理学，研究依托于地理因素及环境的国家战略和行为。历经 19 世纪末马汉的“海权论”、20 世纪上半叶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陆权论”、杜黑和塞维尔斯基的“空权论”等流派的充实和发展，地缘政治学从“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工具”这一污名中解脱出来，日益成为国家间政治战略制定及分析的重要视角和手段。地理因素与环境长期、大体地“不变”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空间距离相对“缩短”，加之世界各国权力的此消彼长、权力格局的动态“变化”，这些因素的组合互动给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带来多种可能。本期闻道开辟“地缘政治篇”，对麦金德与斯皮克曼“陆权论”的理论联系进行再思考，并以此出发，看南海仲裁案中的小国与大国、大国与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互动与博弈。

麦金德与斯皮克曼地理政治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崔屹鸣*

【摘要】本文集中探讨麦金德与斯皮克曼地理政治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梳理了麦金德对于“心脏地带”概念的两次修正，表明他逐渐开始认识到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对于“心脏地带”地理政治意义的理解逐渐向斯皮克曼靠拢；第二部分分析了斯皮克曼和麦金德地理政治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对于地理政治互动模式的认识不同，但灵活性是两位地理政治学家思想的共同特征；第三部分揭示了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地理政治思想共同的理论底色——均势理论，并指出在维护欧亚大陆均势这一点上，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思想实际上合流了。

【关键词】麦金德；斯皮克曼；地理政治

一、麦金德对于“心脏地带”概念的修正及其向斯皮克曼的靠拢

麦金德在他的三部著作中对于“心脏地带”的概念进行了两次修正：第一次修正出现在 1919 年《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麦金德将“枢纽地带”的地理范围向南扩大到中亚、西亚山地；向西扩大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水域，并将其更名为“心脏地带”。麦金德此次修正的原因首先是德国已取代俄国成为海上安全的主要威胁；其次是“人力”和“组织”因素的影响（“心脏地带”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是人力的首要聚集地，且他们随时有可能被某种极权体制组织起来）。^①第二次修正则体现在 1943 年麦金德的《圆形的世界与和平之胜利》一文，其中对“心脏地带”的概念作了最后修正，最重要的变化是位于苏联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勒拿地区）被排斥在“心脏地带”之外。麦金德 1943 年对于“心脏地带”概念进行最后修正的原因是“勒拿地区”现有的人口密度使它的战略潜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根本

* 崔屹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① H.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78.

无法发挥出来。^①

麦金德对于心脏地带概念的两次修正表明：心脏地带内部的地理重要性和资源、人力禀赋远非均质。麦金德 1919 年《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和 1943 年《圆形的世界与和平之胜利》两书中对于“心脏地带”的修正（除去叶尼塞河以东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加进了黑海—波罗的海之间的东欧地区）更加重视东欧地区、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②这促使我们进行如下思考：如果世界岛存在一个心脏地带，那么这个心脏地带的“心脏”在哪呢？麦金德在他的经典三段论中为我们留下了线索，“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③，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在东欧——这个集东方三大专制主义强国和三大人力资源基地为一身的地带。最终，我们发现潜在统一心脏地带的强国全部位于心脏地带的边缘，如果麦金德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重新思考“边缘地带”的地理政治地位，就不难发现“边缘地带”的非边缘性。但无论如何，他晚年已经开始思考心脏地带内人力最为集中、技术最为先进、组织最为发达的地区。不难看出，随着麦金德思想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他对于“心脏地带”地理政治意义的认识逐渐在向斯皮克曼靠拢，甚至出现某些合流。

二、麦金德与斯皮克曼各自理论的灵活性

（一）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根本区别及后者思想的灵活性

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对于地理政治互动模式认识的差别：在麦金德叙述的历史中只有一个永恒的冲突模式——海上强国 vs. 心脏地带；然而斯皮克曼却以边缘地带权力分布的集中程度划分出两个冲突模式：一是海上强国与边缘地带的一部分 vs. 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另一部分，二是边缘地带的单一权力中心 vs. 海上强国与心脏地带联盟。^④

① H.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4, 1943, pp.595-605.

②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p.15-31. 帕克认为，在《圆形的世界》一文中，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的规模和重要性都缩减了，而“地中海”成为了人类活动的焦点。

③ H.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106.

④ Michael P. Gerace, “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 Geopolitics, Containment and Afte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10, 1991, pp.347-364. 又见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由此，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在的灵活性。两种地理政治互动模式中的哪一种会成为现实取决于边缘地带的整合程度。当边缘地带处于羸弱和分裂状态时，就会出现海上强国与边缘地带的一部分 vs. 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另一部分模式；当边缘地带统一并由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所主导时，就会出现边缘地带的单一权力中心 vs. 海上强国与心脏地带联盟模式。

应当指出，斯皮克曼并未对这两个地理政治互动模式赋予同样大的权重。斯皮克曼的核心关切是边缘地带不应当出现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他认为边缘地带并非同等重要，有三个潜在的力量中心，分别是西欧、远东和未来的南亚次大陆），因此，在这两个冲突模式中，斯皮克曼更注重后者。毕竟，现代世界形成以来英美从未同俄国陷入直接冲突，对于美国而言，被包围的危险并非肇始于心脏地带，而是来自边缘地带。^①

（二）麦金德思想的灵活性特征

“麦金德预言”——即控制心脏地带的单一强国将有可能主导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并不针对某个国家，威胁可以来自任何（有能力）追求“枢纽政策”的国家，包括俄国、中国和德国。^②在 1904 年的文章中，麦金德担心的是一个现代化的俄国，尤其是一个与德国建立联盟关系的俄国。但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在其 1919 年和 1943 年的文章中，麦金德所担心的国家就变成了德国。而根据麦金德的理论，苏联则在逻辑上毫无障碍地从问题变成了解决办法：

“德国需要来自心脏地带的陆权和北大西洋方向的海权组成的坚强堤坝，施加双向控制。要使德国人确信，任何德国挑起的战争行为都将意味着德国的两线作战。一旦德国表露出任何不轨倾向，地中海三国必须和俄

^① Michael P. Gerace, “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 Geopolitics, Containment and Afte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1991, pp.347-364.

^② “The substitution of some new control of the inland area for that of Russia would not tend to reduce the geogra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ivot position. Were the Chinese, for instance, organized by the Japanese, to overthrow the Russian Empire and conquer its territory, they might constitute the yellow peril to the world’s freedom just because they would add an oceanic frontage to the resources of the great continent.” See H.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4, 1943, pp. 595-605.

国紧密合作，以武力迫使德国恶魔永远抬不起头来。”^①

任何追求“枢纽政策”的国家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统一心脏地带的单一强国，这一结论体现了麦金德地理政治思想内在地具有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的另一处体现是麦金德 1943 年提出的“地中洋”构想（实现美英法的联合，法国是桥头堡，英国是机场，美国是人力资源和工农业生产基地），它被设计出来解决德国问题，但后来却同样在逻辑上毫无障碍地转变为旨在遏制苏联的北约原型（麦金德在具体政策上从来没有主张过对苏遏制政策，但在现实中遏制政策却是那么適切地符合麦金德的地理政治运动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潜在控制心脏地带的强国是德国还是苏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防止苏德联合或被统一，为此，“地中洋”联盟必须一以贯之地执行均势政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在这里，防止心脏地带被单一强国统一这一内在的战略逻辑是永恒的。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面临着来自各种观点的挑战。有学者认为，由于苏联解体造成的长期恶果，俄罗斯联邦在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羸弱不堪的；重新崛起的德国已经被包容在一体化的欧洲框架内，不可能再掀起大风浪；美国权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不可撼动；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上述形势的发展使得麦金德对心脏地带被单一强国所统一的忧虑已经过时。但这样的指责都无法构成对麦金德理论的实质性挑战——现有的国际权势分布格局不会撼动麦金德地理政治思想的重要价值。这是因为，国家间的权势变动是相对频繁和莫测的，大国勃然而兴、倏然而灭，但世界地理的空间分布却是相对永恒的，因此地理政治的变动模式也是相对稳定的。世界上的陆地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北半球的“世界岛”，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对于西方 / 美国的实质性威胁只能来自欧亚大陆。^②上述批评只能证明麦金德的预言还没成为现实，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成为现实，但却无法证伪它的存在。谁都无法预料在未来的十年中是否会有潜在统一心脏地带的强国崛起，距

① “[Germany need to be] controlled by strong embankments of power on either hand --- land power to the east, in the Heartland, and sea power to the west, in the North Atlantic basin. Face the German mind with an enduring certainty that any war fought by Germany must be a war on two unshakable fronts. ... It is necessary that those three and the fourth conqueror, Russia, be pledged together to cooperate immediately if any breach of the peace is threatened, so that the devil in Germany can never again get its head up and must die by inanition.” See H.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4, 1943, pp. 595-605.

② Colin Gray, “In Defens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3, No.1, 2004, pp. 9-25.

离西方在 20 世纪第三次击退来自心脏地带企图统治整个欧亚大陆的进犯，不过 24 年而已，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麦金德预言的危险可能是确实存在的，而西方国家经不起哪怕是一次战略失误。所有这些批评都是历史的过客，而麦金德的地理政治思想却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

麦金德的地理政治思想为长达 400 年的英国对外政策的金科铁律提供了理论性概括：保持大陆力量的分裂。心脏地带理论点出了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一个永恒利益，并基于此推演出一个永恒的政策：英国 / 西方必须承担大陆义务，加入旨在遏制谋求大陆性霸权的大陆国家的均势联盟当中，以避免麦金德的预言最终成真。不难看出，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地理政治思想的内核都是均势理论，两位地理政治思想家的观点都具有各自的灵活性，这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所表现出的保守、僵硬和扩张倾向大为不同。

三、维护均势——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最大公约数

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思想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但在维护世界均势这一点上，麦金德与斯皮克曼合流了。他们的地理政治思想在本质上彼此兼容，共同描画了一幅完整的地理政治图景，他们的思想对于西方而言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大战略含义。

《圆形的世界》中对于德国问题的安排（来自心脏地带方向的陆权和北大西洋方向的海权组成的坚强堤坝，需要对德国施加双向控制）和斯皮克曼补充的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联手遏制统一边缘地带国家的地理政治互动模式极为相似，也和北约的双重遏制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体现了麦金德晚期对其思想的修正及其同斯皮克曼地理政治思想的一致性。

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对于西方主要威胁的认知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不管是以兼并还是联盟的方式）统一欧亚大陆的单一强国，开出的处方也是那么相似——维持欧亚大陆的均势。^①如果威胁的源头在边缘地带——就像两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那样，西方的海上强国就会与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 / 苏联）结成联盟；如果威胁的源头出自心脏地带——就像冷战所发生的那样，西方的海上强国就会同边缘地带国家（西欧）结成联盟。至于欧亚大陆权势的来源是心脏地带还是边缘地带，似乎不那么重要。这只是一个经验性问题，答案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在二十世纪上半

^① Colin Gray, "In Defens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3, No.1, 2004, pp.9-25.

叶，边缘地带的德国看起来明显地强于心脏地带的俄国，直到二战结束，这一结论才暂时被扭转。我们如果把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经典三段论去掉第一部分，就不难发现剩下的部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责任编辑：夏真真)

作为“边缘地带”的南海

——南海仲裁案的发生机理、内外影响与对策建议

陈子越*

【摘要】：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判决菲律宾胜诉，否定了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并在裁决中表示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透过南海仲裁案整个过程中各国的战略角力，可以展现出各国在南海及亚太地区的战略设计。南海，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成为了“各强国试图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本文将在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领土争端、“边缘地带”争夺与综合国力对比三个方面阐述南海仲裁案的发生机理，并从这一发生机理出发，探讨南海仲裁案对于中国和亚太地区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了中国内部的撕裂与南海问题的复杂化趋势等方面。本文最终将落脚于对中国的对策建议，指出中国政府需要首先明确本国的政策定位，切实地在周边合作中做出一定的成效以消除他国的误解，同时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对话，保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关键词】南海仲裁案；地缘政治经济学；边缘地带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判菲律宾胜诉，并否定了“九段线”，并在裁决中表示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①至此，历时43个月的南海仲裁案落下了帷幕。透视南海仲裁案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作为仲裁案发起国的菲律宾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在仲裁案结果公布后宣布“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中国，在仲裁推进的过程中也并非是不作为的状态，而是通过发表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等途径进行了一定的回应；更进一步地，南海相关海域国家、美国等域外国家也都在南海仲裁案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南海仲裁案已超越了当事国的局限，成为区域性

* 陈子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① 参见新浪网：“仲裁结果出炉 菲律宾称坚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6-07-12/doc-iftwht3631296.shtml?cre=milpagepc&mod=f&loc=2&r=9&doct=0&rfunc>，2016/8/29访问。

和世界性的事件。

透过南海仲裁案整个过程中各国的战略角力，可以展现出各国在南海及亚太地区的战略设计。南海，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成为了“各强国试图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①。本文将以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各国在南海地区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演变与角力，分析南海仲裁案的发生机理以及内外影响，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 领土争端、“边缘地带”争夺与综合国力对比：南海仲裁案的发生机理

南海争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旧金山和约》的签署。《旧金山和约》第二章中明确指出，“日本放弃南沙和西沙群岛等地的主权权利”，但是并没有指出中国对南海相关海域享有主权。对此，中国政府 1951 年 8 月 15 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宣布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一向为中国领土”，反对《旧金山和约》中虽然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海有关岛屿的一切权利，却不提及归还主权问题，重申有关岛屿在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不受任何影响”。^②

但是，1954 年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却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该条约将北纬 21° 30' 以南的西南太平洋地区都划进了军事同盟保护范围，这一保护范围包括了南海大部，成为了南海争端的肇始。

可以发现，南海争端的起始点在于领土争端，但在演变过程中却超越了简单的领土争端范畴。本文将从地缘政治学的领土概念入手，从领土争端、作为“边缘地带”的战略角力、综合国力的对比等方面分析南海仲裁案的发生机理。

（一）作为领土问题的南海争端：南海仲裁案的发起点

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在于地缘，而领土则是地缘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作为地缘政治学奠基人之一的拉策尔，在其《政治地理学》一

①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65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38-46 页。

书中把国家定义为根植于并被自然环境所塑造的政治力量，随后这一观点发展为国家将为保证其生存空间而不断扩张领土。^①虽然此时的地缘政治学家更多地把国际关系看作是西方大国对于陆权的争夺，但是领土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分析国家行为的重要出发点。

南海争端，首先是一个领土争端，体现在本仲裁案中即是中国和菲律宾两个当事国都对包括美济礁、仁爱礁在内的岛礁、相关的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提出了主权诉求，而菲律宾方面认为中国在南海相关海域的活动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对菲律宾的主权构成了侵犯，因此提出了南海仲裁案。虽然中国方面的一贯声明指出了仲裁案提出的非法性和无效性，但在仲裁过程中也并非无所作为，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等声明性文件，对菲律宾的行为进行了驳斥，在领土问题上与菲律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也体现出中国对于领土的重视。

进一步地，作为领土概念的延伸，特别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的完善之后，领土、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争夺也成为了领土争端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南海相关海域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得到了持续的勘探发现，加上原有的丰富渔业资源，资源争夺也成为了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方面的诉求之一。菲律宾方面的诉求包含了中国非法地妨碍了菲律宾享有和行使其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中国非法地默许其公民和船只开发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等内容；而在《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中国政府则指出了“南海部分岛礁的性质和海洋权利问题与主权问题不可分割”^②，这也将资源争端与领土争端做出了有效的归纳，也显示出资源争夺是南海仲裁案中领土争端的重要延伸。

（二）作为“边缘地带”的南海：南海仲裁案背后的战略角力

① 王双：“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问题、挑战及前景——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12年，第15页。

② 参见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07/c_1113547390.htm，2016/8/29 访问。

斯皮克曼在其《和平地理学》一书中做出过经典论断：“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着世界的命运”^①，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南海争端。南海地区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其地缘战略学的位置也十分重要。



图一：南海地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一展示了南海地区的地理位置。从地理上讲，北靠中国大陆和台湾岛，东接菲律宾群岛，南邻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西接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同时，南海与太平洋、苏禄海、爪哇海以及缅甸海相通，海域面积达到约 356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三大陆缘海。^②南海争端虽然发源于领土争端，但是仲裁案的发起与南海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是分不开的。

对于中国而言，南海地区的地缘重要性毋庸置疑。南海是联系中国与

①【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1页。

② 参见中国网：“专家详解南海问题 中国有充分主权依据”，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2-05/11/content_25359482.htm
2016/8/29 访问。

世界各地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同时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南海是中国向着南部和西部方向的重要出海口,而菲律宾提出主权诉求的岛礁也位于出海航线的必经之道。从战略意义上讲,控制了南海相关海域就等于控制了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海域的通道。

对于菲律宾而言,南海的地缘重要性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岛国,菲律宾对于岛礁以及海域的主权更为敏感,提出主权诉求的岛礁从地理上更加接近菲律宾,如果能够取得这些海域的主权将极大地方便菲律宾由东部和北部地区进入太平洋。更重要的是,一旦取得主权,菲律宾可以借此控制由太平洋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提高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话语权。

而南海的争端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之间,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对于南海的战略定位也与菲律宾类似。在南海仲裁案的背后,也包含着中国与南海诸国之间国家安全上的战略考量。

进一步讲,南海仲裁案的当事国虽然是中国与菲律宾,但是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南海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大国之间战略角力的焦点。2011年,美国政府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把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战略的出发点在于一旦中国对南海实现全面控制,其将进而控制欧亚大陆太平洋一侧的边缘地区,从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存在一个军事化力量进一步强大的中国,首先威胁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进而将对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构成颠覆性的挑战。因此,美国借“重返亚太”战略以试图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避免中国在缺乏对手的情况下一家独大、最终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之一,对美国主导下的秩序形成挑战。

美国的这一战略也可以被视为对“遏制”战略的延续。冷战期间,美国的“遏制”战略主要针对“不是苏联的军事进攻,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而是与苏联势力范围相邻的各国内部的心理不适”^①,美国利用“遏制”战略强化了前苏联周边国家的综合国力,使这些周边国家将前苏联视作是对领土安全的威胁,这也最终限制了苏联可能的战略扩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遏制”战略的目标是要阻止大陆中心国家苏联的扩张,战略手段则是控制大陆的边缘地带。由此,美苏之间看似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演

①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转引自时殷弘编：《战略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变成海洋国家与大陆中心国家在陆海边缘地带的霸权争夺战^①。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南海地区，南海争端自美国实行“重返亚太”战略后愈演愈烈。在美国这一战略的支持下，东盟多国频频发难，以期在中美两国的暗斗中谋求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而提出南海仲裁案的菲律宾更是如此。同美国依然保持着军事同盟关系的菲律宾成为了美国用来实施遏制的棋子，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的追求在于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背后的美国则借以增强对于中国的战略遏制，避免中国取得对南海地区的绝对控制权。

特别地，中国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了战略角力的刺激因素。虽然中国在谈及“一带一路”战略时反复强调“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②，但是始终没有打消周边国家对于这一战略的担忧。对于南海争端而言，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深了周边国家对于中国争夺南海控制权的忧虑。虽然中国的战略设计将会有效保证对南海主权的维护，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也同时使“中国威胁论”再次甚嚣尘上，使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采取遏制战略显得更加有说服力。

（三）作为“仲裁”的南海仲裁案：综合国力成为决定性因素

众所周知，无论是对于领土争端、资源争夺还是对“边缘地带”控制权的争夺，有很多方式可以供当事国进行选择。战争、谈判等形式都是可以使用的，而菲律宾选择了进行国际仲裁，这与中菲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是分不开的。

虽然在上文中分析了地缘政治学意义上南海的战略地位以及中菲两国对于南海的诉求，但是在更广阔的现实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国家行为体进行战略决策的基础。相比于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菲律宾显得更加弱小，相比于产生直接的冲突，借助国际法的力量进行仲裁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在力量对比明显占据劣势的情况下，菲律宾选择利

^① 李柯：“中美在南海：两种秩序想象的碰撞”，
http://news.ifeng.com/a/20160714/49352830_0.shtml，2016/8/29 访问。

^②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http://news.xinhuanet.com/gaogao/2015-06/08/c_127890670.htm，2016/8/29 访问。

用一些国际上通行的规则对主权问题进行仲裁，这将回避两国之间力量的直接冲突，这也是南海仲裁案为何是“仲裁”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态度也显示在中美两国之间。虽然美国对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海域控制权有所警惕，不希望中国完全控制这一“边缘地带”，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支持其盟国与中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一个混乱的亚太地区也并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利用国际法对中国进行可能的约束成为了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南海争端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在此次事件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应对角色地位，只是出台一些声明性文件作为回应，面对着与菲律宾之间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中国可以始终以我为主，用不参与的方式应对仲裁案，同时指出仲裁庭的不合法性，从另一个角度破解仲裁案的最终裁决。

二. “仲裁”与仲裁之后：南海问题的复杂化

从2013年1月菲律宾提出仲裁开始，到2016年7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历时43个月的南海仲裁案从程序上宣告了结束。但是，这并不代表南海仲裁案解决了南海争端问题，这一仲裁案对中国国内、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中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南海仲裁案对中国国内的影响

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国家的精神和心理基础。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一经发出，很多普通民众都倾向于加强南海的军事力量，甚至呼吁推动南海争端的军事化解决。这种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内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国内的普通民众希望个人的情绪化表达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希望能够形成合力以影响中国的国家政策。

可以发现，贯穿南海仲裁的始终，中国民众和官方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把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看作是对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甚至呼吁以武力解决南海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层面给出的态度则更加的温和沉稳，一再地表示不参与非法的仲裁案，并呼吁各方将争端解决放回到谈判桌上。而南海仲裁案给中国带来的国内影响也可以从这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在官方层面，最近一次的南海政策调整源自“黄岩岛事件”^①的发生，实际上这也是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从黄岩岛事件开始，中国政府对待南海争端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三沙市的建立、南海地区管理机构的整合、巡航制度的完善等举措展现出的是更加积极的对待南海争端的态度。但是，对于此次的仲裁案，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虽然这完全不是不作为，但是这无法让国内的一些要求所谓“军事解决”的民族主义情绪得以满足。

由此，可以发现，南海仲裁案带来的是对国内民众层面和政府决策层面的双重影响，这也将会进一步体现在中国南海政策的未来发展之上。

（二）“仲裁”的使用：加剧南海问题的复杂化

菲律宾采取仲裁的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而其仲裁结果又被另一当事国中国宣布为非法和无效，这从程序上就导致了混乱的产生。而其他南海海域的国家是否会效仿菲律宾提出新一轮的仲裁、域外国家是否会以仲裁结果为依据对南海局势进行干涉，这一系列问题都还打着问号。仲裁这一形式的使用，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

首先，仲裁是否有效力存有疑问。仲裁案自始至终，中国都保持着这样的态度：菲律宾提出仲裁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行径，没有丝毫合法性。它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违反了中菲一系列双边文件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定，违反了司法需秉持的程序正义，由此而生的仲裁庭及其此后的一切行为也是违法的^②。站在中方的立场上，仲裁案可以被举出很多非法的因素（包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南海仲裁庭调整范围、仲裁庭本身有很强政治性和临时性等等），但是国际关系中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客观中立的裁判机构来证明仲裁案是否无效，只能任由当事国及利益相关国出于本国的立场进行解读。诚然，中国政府所列出的仲裁庭非法无效的理由都是令人信服的，在国际法实践中，一国不接受、不参与国际诉讼或仲裁案件也并不鲜见，但是仲

① 注：“黄岩岛事件”是指，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潟湖内例行作业，突然出现的菲律宾军舰对渔民进行堵截和干扰。中国渔民被菲律宾军人扒去上衣在甲板上暴晒的照片，瞬间成为中国各大媒体和网站的头条新闻，引发全国性声讨。菲律宾的粗暴挑衅和中国国内舆情的强烈反应，促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反制行动，一方面进行紧急外交交涉，另一方面派出海监和渔政船只尽快抵达黄岩岛现场，双方进行了激烈交锋。直至2012年6月3日，菲方船只才全部撤出黄岩岛潟湖。

② 参见光明网：“南海仲裁案：态势、影响及中国应对”，http://theory.gmw.cn/2016-06/30/content_20772938_2.htm，2016/8/29 访问。

裁结果的产生可能会使相关国家大做文章。

其次，菲律宾是第一个在南海争端中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端的国家，这一形式可能会被其他南海国家所效仿。由于南海地区面积较大，中国在此地区的海上邻国众多，一旦仲裁这一形式被其他国家所滥用，将会使得南海地区一直处在混乱的状态之中，甚至会对正常的海上航行、资源开发、油气运输带来不良的影响。

最后，此次仲裁庭虽然被中国宣布为非法，但是仲裁结果已经产生，且对中国不利，这带来的潜在影响在于域外国家可能会以仲裁结果为依据对南海局势进行干涉。在海上，美国派出飞机和军舰抵近中国南海岛礁进行挑衅和威胁。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大国也向中国频频施压，要求中国接受和执行裁决。

当然，南海局势的复杂化并不代表南海局势必然会走向武装冲突。各方态度虽然都异常强硬、斗争激烈，但均没有意愿挑起武装冲突或战争。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差距过大，无意主动挑起战争；美国则更多地通过外交战、法律战等形式向中国施压，对中国在“边缘地区”的控制权进行遏制，一个战火纷飞的亚太地区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并没有好处。同时，各国决策者并不像媒体和民众那样激进，都力图将对抗摩擦控制在可控的局部范围内。

（三）仲裁之后：双边、多边关系的巨大转变

南海仲裁案的提出，对于双边和多边关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亚太地区，中国—菲律宾双边关系的紧张带来了南海相关海域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持续恶化，而这一系列外交关系紧张也导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同时，由于中国因素的强化加剧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也持续加强。

首先，南海仲裁案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中菲关系陷入僵局，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同时，与菲律宾有相同诉求的南海相关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会陷入僵局。特别是在中国宣布不接受仲裁庭的结果之后，南海相关国家都对中国的南海政策产生一定的疑虑。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走出去的必经之路就在东南亚，双边关系的停滞将会直接表现在工程投标上的困难以及双边合作项目的难以推进。当前正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瓶颈期，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行困难可能会使其他国家对中国推进战略的决心和可行性产生疑虑，进而延缓“一带一

路”战略的落地实施及可能带来的红利。

其次，东南亚国家有着自己的国际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中国政府一直反对南海问题的多边化解决，希望能够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下进行双边谈判。但是，作为区域国家联盟组织，东盟对于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有着整合作用，因而由中国南海争端所引发的外交关系紧张也导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

最后，美国因素也是南海仲裁案带来的影响之一。此次南海仲裁案的发生，虽然直接的当事国是中国与菲律宾，但是由于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菲律宾提起的仲裁可以被视作对“重返亚太”战略的呼应。此次仲裁结果的出炉，加上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态度，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更加具有合理性。现在南海地区被美国视为“自己的战略优势区域和中国当前的地缘脆弱点”^①，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联系，美国可以更加深入推进“重返亚太”战略，同时进一步压缩中国在“边缘地带”的战略空间，形成对中国的持续遏制。

三. 跨越南海仲裁案：应对南海争端的政策建议

面对南海仲裁案带来的国内外影响，中国政府需要做出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需要首先明确的是本国的政策定位，切实地在周边合作中做出一定的贡献和成效以消除他国的误解，同时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对话，保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首先，对于南海争端的解决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要占住“理”，要遵循有关规定、条例、公约等；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能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伤；要适可而止，有所节制，互惠互利。对于此次的南海仲裁案而言，中国采取的“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态度以及对于仲裁庭非法性的驳斥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但是在具体表达的过程中则需要采取合适的方式，既要警惕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分激发，也要避免不恰当的表达造成他国对于中国形象以及政策的误解。就目前而言，虽然美国、日本等国敦促中国按照仲裁结果行事，但是世界

^① 参见光明网：“南海仲裁案：态势、影响及中国应对”，
http://theory.gmw.cn/2016-06/30/content_20772938_2.htm，2016/8/29 访问。

上也有多个国家支持中国的主张，如何正确地表达中国诉求应当成为突破口。南海争端还是需要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指导思想，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要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和手段，争端的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来，避免南海问题的多边化趋势。

其次，中国需要理清本国的南海政策，对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要有所预备。就目前而言，除了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一天后，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两万多字《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中国的南海政策还没有一套体系化的政策出台。联系到中国在整个仲裁过程中的被动应对，可以发现，中国的做法可以被称作“以我为主”，也可以被视为“消极应对”。作为南海相关海域最大的国家、作为认为本国对于南海“九段线”以内的海域和岛屿拥有不容置疑主权的国家，中国的这一态度显然不够积极主动。菲律宾提出仲裁案后发表的白皮书也是第一次将中国对南海地区主权诉求进行系统化整合的文件，而“中国南海网”则是在一个月后才得以上线。黄岩岛事件可以被视为中国南海政策的转折点，中国政府逐渐实现了对管理海洋事务的行政和执法机构的整合、对海上维权力度的加大以及保持海上常态化存在。这些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南海维权更加积极主动，但是也存在着前后政策难以衔接的问题。面对其他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不理解甚至是歪曲，中国政府首先需要做的是明确中国的南海政策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对于南海地区的管理体系应当怎样进行完善，这才能在面对他国指责时从容应对。

第三，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着全方位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依然强调中国“长期处在发展中阶段”，将中国定位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中又直接提出了“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周边外交政策中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核心理念。这两种话语宣传体系的并存加剧了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误读，中国需要做的更多是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利用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承担与自身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切实地在周边合作中做出一定的成效，这是应对他国错误解读的突破口。

最后，虽然南海仲裁案当事国是中国与菲律宾，但是依然存在着中国

与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角力。美国旨在通过捍卫以国际规则为导向的南海秩序，来塑造中国的行为，构建一个基于国际规则的亚太安全秩序；而中国更多地以主权原则为导向，追求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面对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中国政府应当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国际法、国际条约等国际规则的加深理解，与美国保持战略对话，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四. 结论

从 2013 年 1 月菲律宾提出仲裁开始，到 2016 年 7 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历时 43 个月的南海仲裁案从程序上宣告了结束。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南海仲裁案发生的起始点在于领土争端，但在事件发展演变过程中却超越了简单的领土争端，南海作为“边缘地带”成为了中美两国之间战略角力的场所。

南海仲裁案的影响不会随着最终裁决书的出炉而结束，南海仲裁案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带来了双边、多边关系的巨大转变。面对南海仲裁案带来的国内外影响，中国政府需要提出积极有效的措施以应对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需要首先明确本国的政策定位，切实地在周边合作中做出一定的成效以消除他国的误解，同时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对话，保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责任编辑：夏真真)



史海沉浮

从清政府对私盐的打击与私盐抗争看清代统治的衰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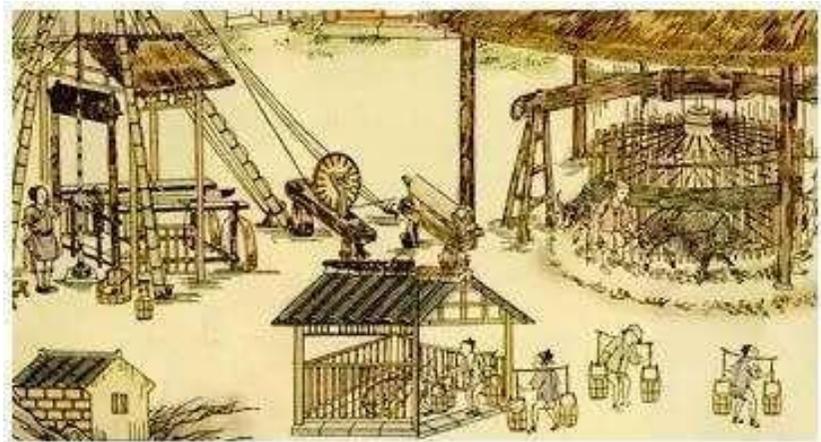
朱信荣*

【摘要】传统中国社会中，食盐专卖制度是重要的经济制度，它使得统治政府能够有效对食盐这一重要资源进行管制，也构成了政府税收的稳定且重要来源，同时亦是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而私盐和盐梟，则是这一制度的对立面，在官盐流通的地区实质打破了官府的垄断制度，这对统治政府而言无疑是严重的威胁。本文将由清代官府对私盐实施的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多方面打击，以及私盐与盐梟对官府垄断的抗争，分析其中体现的清代统治的逐步衰落。

【关键词】私盐、食盐专卖制度、抗争、统治

贩卖私盐、走私食盐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自唐以来，各朝代的政府都对私盐现象予以相当严厉的打击，针对私盐的打击，也可视为是体现当朝政府管治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私盐现象到了清代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清政府针对私盐的打击也达到历朝之最，而盐梟到清后期势力发展壮大到了甚至可直接参与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之中。因此，打击私盐和盐梟的反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能够体现出清代统治的变化。

* 朱信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井盐制作 汲卤运卤

一、清政府对私盐的“严打”

清政府针对私盐的管制措施可谓严厉。私盐在清代主要分为逃避税课的盐和跨地域贩运的盐这两种，针对这两种私盐，清政府从源头开始严格防治。在产盐的地方实行保甲制等制度堵截私盐，另外在流通环节，颁布多个针对性法令，同时在各行盐口岸设立缉私卡巡，以防阻边私、潜私及袅私等私盐的透漏。^①其中特别是法律上的有关制度，其严苛程度足见当时私盐现象的猖獗。

清代承袭明制，早在《大明律》中就有12条法律直接和打击私盐有关，而清代自一开始就承袭明代对私盐的严苛法律。清初就有法律规定，“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斩，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人牙人及窝藏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檐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②

到了后来，私盐现象进一步增加，清政府决定增大法律力度，针对私盐现象最主要的来源泉私，特别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这些规定甚至细致到了特别针对所有可能参与到私盐贩运有关的各类人士中。比如针对船私，有《夹带私盐律》，其中规定“凡回空粮船，如有带私盐，闯关不服盘查，聚至十人以上，持械拒捕，杀人及伤人三人以上者，为首并杀伤人之人，拟斩立决。未曾下手杀伤者，发边卫永远充军。……头船旗丁，头舵人等，虽无夹带私盐，但闯关者，枷号两个月，发边卫充军。……”

^① 吴海波、李曦：《清政府对私盐的防范和打击》，《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4页

不知情不坐，卖私之人及灶丁将盐私卖与粮船者，俱各杖一百，三千里。窝藏寄顿者，杖一百，徒三年。”^①

由处罚措施可见规定的严苛，违法代价并不低。针对参与私盐贩运的兵丁，清政府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约束这一行为，如《兵丁贩私法》等，虽然在后期因考虑到兵丁本身就是官府的重要统治工具，处罚力度有所降低，但有关法律依然发挥了一定作用。针对盐商，当时的法律亦有规定“凡客商贩卖官盐，不许盐引相离，违者同私盐法。其卖盐了毕，十日之内不缴退引者，答四十。”^②力度虽远不及针对其他相关人员的惩罚，至少也说明了清政府在打击私盐这一行动的决心。

除了法律法规分门别类针对可能涉及私盐贩运行为的人员作出各项规定，实行严格的法律规管外，清政府当时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对私盐行为进行更为严厉的打击。这些法令的惩罚力度，甚至还要高于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如《豪强贩私律》这一针对盐梟的法令中，针对盐梟的贩私行为，法令有如下规定：“凡豪强盐徒，聚众至十人以上，掌驾大船，张挂旗号，擅用兵仗响器，拒敌官兵，若杀人及伤三个以上者，比照强盗已行得财律，皆斩。为首者，仍梟首示众。其虽拒敌，不曾杀伤人，为首者依律处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若贫难军民，将私盐肩挑背负，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③法令的打击力度可见一斑，几项较重的刑罚甚至可以合并处罚。而法令的规定范围绝不仅仅是针对盐梟而已，惩治不力的官吏也会被追责，清政府在法令上的惩治可谓少有。

法令之外，在严格落实缉私制度中，清政府更是采取了多种措施。最被广泛采纳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增加关卡，增加巡役，严防死守。在江西，“缉私卡十有七”，一个省就已经设置了十七个缉私关卡。在湖广地区，清政府更是严防四川地区的私盐流入，如乾隆三十五年，盐政李质颖等奏：“伏查宜昌为川私入楚之门户，实淮南纲地之藩篱，设卡稽查，最关重要，而审机扼隘，尤在得益，现在设凯处所，自东湖县所属平善坝起，距巴东三百余里，……过往客船，始能停榷。巡役方可盘验。故于此间设卡。自西坝以下一百五十里，为宜都县之白洋河，……商门舟楫，必于此停泊，恐有私盐船只由卡逸出，故于此处亦设有巡役节检。……今酌议于白洋一

①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86 页

② 同上，第 177 页

③ 同上，第 179 页

处添设巡役二十名，巡船四只，选择勤慎干练之人，专司其事，原有之巡役，一并责令督率巡查。”^①沿江凡遇港口都要配备巡查人员，甚至上奏建议增加人员配置，可见清政府当时在巡查上的力度，监管程度历代以来并不多见。

总归而言，清政府在缉私和打击私盐方面投入巨大，不论是颁布各类法律法规和针对性的法令，还是增加各地关卡以强化对盐运往来的监管，都体现出了清政府在打击私盐、维护食盐专卖制度上的坚决态度，然而，比历朝历代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并没有使得私盐现象较过去有所减少，相反，清代后期，私盐贩运变得更加猖獗。私盐贩运的活跃与盐枭势力的扩展对政府的统治权威构成了十分严重的威胁。

二、私盐贩运与壮大的盐枭

清代，政府对私盐保持高压政策，出台各类政策严防私盐贩运，但官盐的高价和民间的需求使得私盐并没有在政府的打击下有所收敛。在一些地方，私盐贩运十分活跃，甚至到了几乎全民贩盐的地步。而各类盐枭集团的势力也不断壮大，使得政府的防范越来越困难。



清代两淮盐票

例如，在当时的江苏淮安，此地为重要的漕运中心，附近也有长芦盐场和两淮盐场这两个重点盐产地，漕运造就了当地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也为私盐贩卖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利用漕船进行私盐贩运，虽然并不是清

^① 李澄辑：《淮鹵备要》，扬州文枢室书房刊本，道光三年。

代私盐贩运的主要方式，但是漕运的大运输量，使得漕私迅速在这一地区成为最主要的贩运途径，而且制造了巨大利润。早在明代，此地漕私就已相当活跃，而到了清代，漕船贩运私盐更是愈演愈烈。在顺治末年，就已经有“回空粮船约有六七千只，皆出瓜仪二闸，其船一帮夹带私盐，岂止数十万引，合而计之，实侵淮商数十万引盐之地，为害未有大于此者”的记载。而根据道光时期两江总督陶澍的奏折，每艘漕船携带私盐“约计千余石”，按运河之上4000艘漕船的数量计算，私盐总数达到了四百万石以上。^①

如此严重的漕私现象，清政府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然而清政府实际在这一地区漕私的管制上有心却无力。南北来往漕船数量数以千计，大多与私盐有关，而运军之间甚至为了漕私结成利益同盟，检查其中一艘漕船，就可能意味着运军和官军在江上的对峙，阻塞河道交通，极容易引发严重后果。而漕运承担着“送粮进京”的任务，是否能够及时运输漕粮到达并空船返回，显然是清政府更为关注的，因此在保证漕运畅通的前提下，也只能对私盐贩运的行为视而不见。^②一旦针对每艘漕船进行“地毯式排查”，本身也会大大降低漕运的效率。

同样是在淮安，另一股重要的私盐贩运势力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当地的盐枭集团。清代开始，私盐贩运势力逐步组织化、规模化，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盐枭集团，而其影响力也随着时间推移和私盐贩运的公开化，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在淮安，盐枭集团是另一重要的私盐贩运参与者，他们与负责漕私的运军有着密切的交易往来，又通过吸纳大量当地平民参与到私盐贩运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贩盐产业链”。这些盐枭集团并不仅仅是规模庞大，他们的队伍武装化，配备武器，其战斗力甚至胜过当地官兵。初期这些盐枭集团还只是分散存在，其后组织愈发严密，而清政府对他们的清剿效果也愈发有限。当时有人甚至这样记载当地盐枭集团不可一世的姿态：“向在乡镇，见私盐百余石，络绎而来，每数石则一人执双刃导于前，兵役见之，莫敢谁何，乃复俯首乞怜，以索规费”。^③而当地民众也参与到贩运之中，成为盐枭集团的一份子。他们常按盐枭的号令行事，密切配合，将私盐贩运到指定的地方售

① 林盼：《清代私盐贩运与地方社会——以淮安为例》，《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卖。如雍正年间，兴化、盐城、阜宁、泰州一带地方，有小船假作乞丐或运粮食、蔬菜，或带银钱、布匹等货，至各场灶换买私盐。在盐梟指挥下，这些小船运到下河之后，又前往淮安、宝应、高邮等，或搬运过洪泽湖、西山等处发卖。^①盐梟集团的影响力已经到了当地民众多参与到私盐贩运中的地步，可见其势力之广，以及当时私盐贩运之猖獗。

而盐梟之影响力远不止于此。盐梟面对清政府对私盐贩运的严厉打压，不满情绪累积，加之他们的组织性特点和部分武装化的特点，使得他们开始直接采取暴力抗争的形式来反抗政府的管治。

早期，这些抗争多为自发性的抗争，其目的也较为单一，无非泄愤报复而已，对象也往往是垄断贸易的盐商，有时也针对有关的地方官吏。而清咸丰年间开始，盐梟开始和各地的会党势力结合，抗争的规模逐步扩大，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泄愤斗争而已了。如光绪间，川盐边岸，著名盐梟，“漏网帽顶之马如松等烧会结盟”，封设廿四神将，廿四摆马都司等职名，“阻挠官运，结党横行，目无法纪”，以致官引各岸“商等畏难歇业”。^②

而晚清年间，四川的“盐梟之祸”更是成为当时一大事件。同治初，在“著名巨梟，又系著名会匪”谭二疯王、任韦驮、江大烟杆、任长蛮等领导下，各路盐梟联络起来，公开义举。数年间，他们转战于千里川江沿线，不屈不挠与官军奋战了“十余年”，重创提督胡国珍、夔州副将吉恒，“拒毙官兵不记次数”。^③一直到了光绪四年末，这起祸乱才最终被清政府镇压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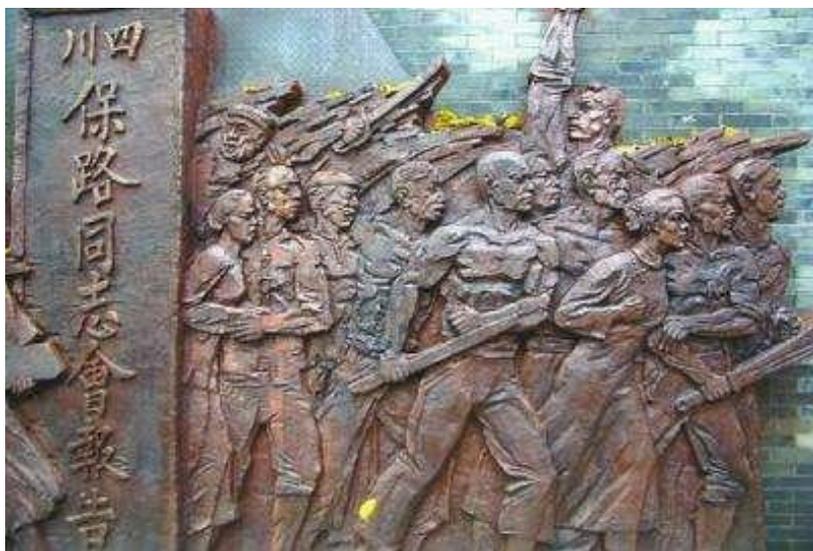
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辛亥革命中，盐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早于武昌起义的四川保路运动中，义举之后广大梟私贩众响应，纷纷汇集同志军行列，“毁盐店，击岸商之暴动”遍布全川，他们截夺官运盐局货财来支援当时的同志军。^④盐梟到了清朝历史的末期，甚至直接参与到了政治运动当中去，可见盐梟的壮大与清政府严打严防私盐一系列举措的彻底失败。

① 林盼：《清代私盐贩运与地方社会——以淮安为例》，《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鲁子健：《封建垄断下的私盐抗争》，《盐业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同上。

④ 同上。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盐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活跃的私盐与衰弱的统治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权控制相当严格的朝代，清政府统治者的专制程度甚至可超越之前的朝代，其法制亦如此，然而即便是严格的法制依然未能有效打压私盐贩运。而私盐的活跃程度反而超越之前的历史时期，甚至到最后成为摧毁清政府统治的其中一支重要力量。那么私盐活跃与打击私盐的举措，和清政府统治的衰弱之间又有何种联系？

首先，清政府对私盐的防范虽然政策严厉程度超过以往朝代，但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对私盐的打击力度本身就被削弱，而一些措施更是进一步暴露了历代承袭的食盐专卖制度的弊病。比如，针对私盐的各种间接性法律，特别是一些针对特定人员的法律，其惩罚力度的差异，使得法律面前人人根本无法平等。针对兵丁贩卖私盐，清初的法律规定相当严格，刑罚甚重，而到了清中叶措施就被逐步减轻了。同样的，针对盐商的处罚力度也相较盐梟的“非斩则绞”的重刑来说轻得多，主要还只是杖刑和上缴罚款而已。针对兵丁的刑罚减轻，还是终归源于统治集团希望保留仍有利用价值的统治工具而已，然而有区别的法律规定和刑罚也使得对私盐的打击力度减弱了。而清政府在一些地方的措施，更是助长了食盐贸易中的垄断，反而无法对私盐构成真正抑制。如清政府赋予两淮总盐商缉私义务，总商可以“设立巡船，招募巡丁，协同守口员查缉。”而让商人缉

私，商人自然就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和垄断盐业的地位，而严厉打击，但这最后只是为了商人自肥而已，这自然是弊端百出。^①鼓励商人自行缉私或加入缉私队伍，只能进一步加深统治者与百姓的矛盾，其对平民利益的严重损害，也会大大削弱统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其次，到清代，食盐产量较过去有所增长，经济水平也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同时清代随着人口增加，市场对食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食盐专卖制度的弊病被进一步暴露出来。而私盐贩运本身又有着巨大的利润，商人甚至平民都参与到了交易之中，正如同淮安地区的例子一样，在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和商业中心，私盐贩运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交易系统。民间私盐贩运与贸易的增长，已经是逐步脱离清政府的控制了。活跃的私盐意味着食盐专卖制度已经接近一个需要废除或大举改革的临界点，而清政府的统治性质使得其不愿放弃如此重要的税收来源，这只能是进一步抑制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盐枭集团，最终集合形成一股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其对私盐打击行动的抗争，也最终将会与其他社会抗争合流，对清政府希望维系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由咸丰年间直至清末，盐枭的一系列成规模的抗争就是最好的例子。社会经济发展到新的程度，而统治政府继续维系原有的政策，已经是落后于时代了。清政府控制力的下降，其统治的逐步衰落，至此也就成为了必然。

因此，从清政府打击私盐举措、民间的私盐抗争这两方面来看，清政府是逐渐在维护食盐专卖制度这一传统社会的重要制度中失去主动，进而影响到其有效管治，最后导致其统治彻底衰弱，最终失去对国家社会的掌控。应当说，私盐活跃与打击私盐这两面在清代的变化，恰好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逐步走向近代社会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活跃的私盐贩运势力，也或许是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陆依宁）

^① 吕一群：《清末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与政府的缉剿》，《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Three Scenarios for Development of the High North till 2030: Implications for Fisheries

Andriichuk Pavlo
Litovchenko Ekaterina
Olsen Julia
Ponomareva Anastasia
Shi Shuyi
Toporov Aleksei
Valiev Zaurbek
Zorinova Alina

The Arctic region is a “*highly dynamic socio- ecological system*” (Young, 2010) facing a number of rapid and dramatic changes that have global implications.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Arctic and its interconnection with other global regions, the number of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future Arctic development may increase. Actually, before speaking about the Arctic we should mention that among many its definitions of we choose the common definition describing the Arctic as an area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line (66 33’ 44’’). In this paper, we will describe firstly the assumptions, uncertainties and wildcards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e Arctic region,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that affect the Arctic development. Then, based on these variables, we will present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Arctic in 2030. And, finally, we will map the influence of them on the fisheries (wild fish) in the Arctic. Our variables a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ou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ideas, as well as scientific data and professional reports.

Assumptions

Global warming is one of the crucial issues which will affect the Arctic region since the warming rates are greater here than in the rest of the globe and higher expected temperatures, precipitation and extreme storm activities take place here. Primary industries and communities whose livelihoods heavily rely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ill be affected by these changes. Climate change can simultaneously both open and limit access to the Arctic (AMAP, 2011: 10-12). While transportation over permafrost and ice roads becomes more problematic, the sea ice retreat creates longer open-water season and opens new navigation routes, new resource frontiers and enables new industries (Loe et al. Meier et al. 2014).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at a new climate agreement was adopted at the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21) in Paris, France December 2015.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ill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resources and will address the issue of food security. According to Rudloff, nowadays ocean supplies only 4% of world's food, that's why fisheries industry has good prospects in the High North region (Bettina Rudloff, 2014). Population dynamics is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ishery patterns and the importance of such issues as fish habitat destruction, predation and optimal harvesting rates.

Changes in biodiversity also may influence the Arctic development. If some species disappear, there will be the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of some other

species and the natural balance between them will be disrupted. Meanwhile, such changes can take place as the demand for some species (for instance, cod, salmon etc.) is much greater than for the others (that we don't use for food). In this case, the resilience of nature is also of a great importance.

Need for regulations (policy strategie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precautionary approach) will further expand as all the activities in the High North should be controlled on the governmental level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gion. However, stricter regulations may also limit business involvement in the Arctic as it will be more costly to support any activities here. According to Loe, towards 2030, a new bind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about limiting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may be reached and the Arctic development will be undoubtedly influenced by such an agreement, as it would provide th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CO₂-intensive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will be organized (Julia S. P. Loe, Daniel B. Fjærtoft, Philip Swanson, Erik W. Jakobsen, 2014).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an occur in many fields including monitoring gadgets, ship design, oil rig design, mining equipment, resource extraction methods, robotic IT tools used for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advanced vision systems (such as robotic hands which are especially required in cold climate as it enables so-called “tele-presence” solutions and reduces the need for people) and so on, it can dramatical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any industry in the Arctic region.

Stakeholders

Eight Arctic states (Russia, Norway, Denmark, Iceland, Finland, Canada, USA, Sweden) are key actors in the developing of the High North. These states, especially **five coastal states** (Russia, Norway, Canada, USA, Iceland), will define in great extent the situation in main industries such as fisheries, mining, oil and gas extraction, shipping etc. Besides, there are other interested states that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rctic activities (China, India, South Korea etc). For instance, China actively inv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Sea Route.

Regulatory bodies that establish rules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via the initiatives concerning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Arctic. For instance, the High Arctic Ocean Fishing Agreement i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by the five coastal states. The potential of commercial fisheries in the High Arctic Ocean is being discussed.

Scientific organis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es of the Arctic region and its ecosystem.

The Arctic Council is a high-level intergovernmental forum that addresses the issues important for the Arctic government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he Arctic.



NGOs. Differen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struggle for the better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etc.

Indigenous people. Local population that live independently on limited territories and is involved in primary industries (say, the Nenets).

Business industries. Representatives of fishing, trade, shipping, resource extraction, tourism and other industries that may take place in the Arctic region.

High North Heroes/ trend makers. Famous people (artists, sportsmen, politicians etc.) who can shap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challenging issues and inspire them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Uncertainties

Role of indigenous people. The role of indigenous people of the Arctic is quite uncertain. Actually, they are directly influenced by all the changes in the region. However, what will their reaction towards these changes be and whether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will listen to their opinion is unclear.

Ne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wards 2030, there will be new bind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resolutions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s. There will be also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in this sphere.



China's strategy in the Arctic. As a permanent observer in the Arctic Council, China has a position on the Arctic affairs. The relevant uncertainty lies in the China's strategy till 2030 in the region.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i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oke extra demand for Arctic resources? Will China invest more into the Arctic development? Will China claim a bigger role on the Arctic issues?

Energy resources consumption.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oil and gas dominance in the world energy consumption may be weakened in the nearest 15 years either from the demand or supply side. For instance, oil price may be too low to make the profit from the oil and gas extraction or the world may switch to the alternative sources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ccessible routes to reach the Arctic region, appropriate transport to move resources from it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items are needed to develop different scopes of activities in the Arctic. On the contrary,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fishery, oil and gas, tourism) can influence the infrastructure level.

Human and labour migration. As the world population and labour force increase, climate changes happen, some people can move from overpopulated

regions of the world to the less populated ones, especially if there are some well-paid industries to be engaged in there.

Arctic and non-arctic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s. Many countries are interested in the Arctic region as a resource base or as an untouched healthy territory that influences the world climate or as something else. Countries may cooperate to follow their purposes and to restrict the dominance of each other in the region or they may clash with each other while defending their interests.

Arctic claims: Russia ask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boundaries has been approved. Following the Russian example, the similar applications were submitted by Canada and Greenland. These applications will be implemented into reality by 2030. Generally, the process will result in the greater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either provoke a number of conflicts within non-Arctic nations or may jeopardise the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Tourism, cruise tourism/ fish tourism may have unexpected development in the Arctic. There i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Arctic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partially thanks to the so-called tourism phenomena of the “last-chance tourism” (*“a travel trend whereby tourists increasingly seek for experiencing the world’s most endangered sites before they can vanish or can be irrevocably transformed”*) (Lemelin et al. 2010). And the results are waited to be seen.

North Sea Route and shipping activities in the Arctic are also uncertain, this is due to the changes in climate conditions and trends in the global market.

Three Scenarios

Scenario 1. “Keep Calm and Go Green”

- Climate agreement is adopted in all 195 countries and mitigation policies (CO₂ reduction) are implemented.
- Shift from fossil fuels toward renewables
- Stable population in the High North
-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rctic Nations, mostly in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fields
- Changes in the lifestyle and the consumption behaviour

- New food sources: more food production from the ocean
- Northern Sea route is used mostly for the tourism purposes, fisheries and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primary industries

Scenario 2. “Work Hard”

- Lack of adaptation of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CO2 reduction) to the reality, greater extent of the global warming
- Population growth (labour migration)
- Arctic as a new resource frontier
- Pressure on the primary industries
- Science development
- Possibility of conflicts between nations interested in the Arctic resource development
- China’s (and other Asian) interest in the region and dramatical investment’s increasements
- Northern Sea route as a new corridor for the global market
- Lack of the involve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Scenario 3: “Hands Off”

- Conservation of the Arctic resources
- Cooperation between Arctic and non-Arctic nations
- A greater influence of the Arctic Council
- Slow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North
- Develop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 Northern Sea Route used mostly for domestics deliveries
- Decrease of the China's investments in the Arctic
- Stronger voice of indigenous people

| | | | |
|----------------------|---|------------------------|------------------------|
| Uncertainties | “Keep Calm and Go Green” | “Work Hard” | “Hands Off” |
|----------------------|---|------------------------|------------------------|

| | | | |
|--|--------|--------|--------|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 Medium | High | Low |
| Human & labor migration | Medium | High | Low |
| Arctic and non-Arctic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 High | Medium | Low |
| Arctic and non-Arctic governments confrontation | Low | High | Medium |
| Voice of indigenous people | High | Low | Medium |
|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and agreements on climate change | High | Low | High |
| Role of China`s interest in the Arctic | Low | High | Medium |
| Tourism | Medium | Low | Low |
| Shipping (NSR development) | Medium | High | Low |
| Arctic nations borders` definitions | Medium | High | Medium |

Implications for fisheries



The population growth will add extra pressure on marine food production that today presents only 2-4% of global food production. Fish is also a food resource with low climate impact, but there is also a lot of emission coming from fish transportation. Besides, the fishing industry is facing a number of challenges. The climate change is going to affect ocean environment by higher averag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more extreme weather, higher salinity, sea level and ocean acidification. Those changes will result in movement of marine species more north (algae, jellyfish, sea lice) and increase in biomass of boreal fishes in the Arctic Ocean.

Scenario 1. “Keep Calm and Go Gree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will b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is scenario development. The global demand for marine food will dramatically increase in order to improve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will lead to change consumption behaviour (more fish than meet consumes). However, this will lead to new fishing regulation where the High North Ocean fishing agreement is adopted by all Arctic and non-Arctic nations. Fish will be mor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locally. More income to local Arctic communities from fish production. Climate change will also add challenges to dry fish production in Lofoten (due to increased precipitation fish will not dry completely).

Scenario 2. “Work Hard”. Dramatic increase in fishing and possible cases of overfishing will require strong regulations. Fishing vessels need new insurance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fish in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The Arctic will be an attractive region for commercial fisheries and more countries are showing interests (mostly Asian). Conflicts with Aquaculture activities.

Scenario 3. “Hands Off”. Commercial fishing in the Arctic gradually decreases after the adoption of a High Arctic Ocean Fishing Agreement while fishing farming increases dramatically in the North (Northern Norway, Russia and Canada). This growth presents the possibility for diseases spreading for the wild fish as well. However, a number of companies place their farming facilities offshore in order to reduce sea lice and adapt to hard weather conditions. This leaves the Arctic coast “untouched”. Fishing tourism is very popular in the Arctic,

but the quote is decreased. Wild fish prices increase dramatically resulting in changes in fish market structure. The catch fish produces mostly locally.

Wild Cards

Cooling of the Arctic. Although global warming is considered as an assumption for various scenarios, it may follow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eyond our expectations.

Meteorolite/Aliens. Meteorolite falling from the space and hitting the Arctic by some aliens is a less possible scenario but it still may take plac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n people's history, if a new one occurs in the period till 2030, the conditions in the Arctic will change greatly.

Major oil spill may happen and it will influence dramatically the ecology of the Arctic region,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Arctic and its future in general as well the activities that will take place here later.

Military conflicts. Under some unlikely circumstances, military clashes may take place in the Arctic region. It will affect ec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he Arctic.

if a new one occurs in the years till 2030, the conditions in the Arctic will be influenced greatly.

（责任编辑：陆依宁）



赴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短期交流

感悟

张莹*

背景简介

2016年11月28-30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举办了名为International EAEU Model的学术交流活动，我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张莹同学前往参加。本次学术交流活动以欧亚经济联盟为背景，既是一次学术会议，也是一场外交角色扮演的策略游戏。每位与会的学生将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中一个成员国的代表，通过谈判协商、外交斡旋等方式，共同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中的问题应对和决策制定。这项学术交流活动是一项长期的活动，了解详情可以访问网页<http://eaeumodel.ru/eng/about>。本文是张莹同学对本次活动的回顾与思考。

2016年11月28号，我参加了由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主办的“International EAEU Model”的学术会议。这次的交流活动虽然短暂，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交流活动不仅使我的专业知识水平得到提升，还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

飞机从上海起飞时，整个城市还是绿树环合的景象。快要达到莫斯科时，从机舱向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绵延的雪山。长途飞行十分劳累，可是看到这样的美景心里又感到欣喜。到达莫斯科时夜幕已经降临，飞机降落的过程中看到整个城市闪闪的灯火，形态各异的街道在不同的方向上延

* 张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伸，十分美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莫斯科也确实向我们展现出了它在冬日里与众不同的美丽。

不出所料，莫斯科气温很低，尤其是对于刚从中国的南方飞过去的人来说，气温的反差更加明显。在我停留的这几天里，几乎每天都在飘雪，所有的人都全副武装。莫斯科的城市规划并算不上整齐，但是却非常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就好像俄罗斯文化一样。市中心的到处可见到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楼房和东正教风格的教堂，外形气派，庄严。稍微外围的地区可看到很多苏联计划经济时期修建的规制相同的大楼或居民区。莫斯科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以下三点：首先是莫斯科的地铁。地铁站修建的十分豪华，有“地下宫殿”的美誉。每站围绕不同的主题，印刻着精美的壁画和浮雕，或展示英雄人物的风姿，或者展现出一幅惊涛澎湃的历史画卷。莫斯科的地铁的输送效率非常高，高峰时期每个班次之间只需要等大约一分钟。整个城市的规划呈现出圆形放射状，地铁的修建大致也是这个模式。这不禁让我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北京和上海不能同样效仿这种做法来缓解高峰期的压力呢？其次，莫斯科市内可看到各总各样的雕塑。这些雕塑大多数都是历史人物，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或者民族英雄，使整个城市充满人文气息与文化的熏陶。虽然我不懂俄文，但是能看得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充满的骄傲与自豪。最后，俄罗斯民族对色彩的运用也让我十分佩服。城市建筑 and 市内装潢色彩丰富，多是暖色调，米白、黄色、红色、淡蓝色等，随意走进一家小餐馆都会被里面温热的气息和有艺术感的涂鸦绘画所吸引，米白色的墙体素雅，黄色的温暖，红色的热烈奔放，淡蓝色的梦幻，看上去十分舒服。这些颜色的运用使得整个城市色彩缤纷，充满艺术感，十分和谐。



大街上的雕塑



城市涂鸦

我们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欧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问题，会议的第一天，俄高经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主任，俄罗斯外交部的官员，欧亚经济联盟负责一体化发展的官员与欧亚开发银行的经济专家分别进行了讲座，探讨了近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合作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前景展望。接下来的几天内，每个同学都要代表自己的国家，根据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发言，提出政策建议，行使对政策提案的表决权。这种模式有点类似与模拟联合会。会议的末尾，我们以工作组为单位，提交了经过几天的辩论和讨论之后而形成的决议。最后的议案里，我们就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合作这一问题总共达成以下四项议案：签订合作协议来保障各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创造各个组织经济理事会之间的洽谈机制；各国家要在国内建立负责双重税收协议与转移定价的机构；加强各组织国家之间贸易信息数据的交流。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外学生的参与热情更高，和国内的学生相比，他们在活跃度和积极性方面更高一筹。这使得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要主动地，更加积极地融入到议题的探讨中。



此次的交流对我来说受益匪浅。这次经历让我近距离地接触俄罗斯社会和他们的文化与生活，让我能够跳出自己所在的小圈子，了解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的学生的想法和他们的知识水平，让我意识到自己在知识上的欠缺从而查漏补缺有更多的提升。更长远的来看，将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独自处理遇到的一些困难，也锻炼了我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坚毅的品格，我觉得这是十分难得的。

（责任编辑：陆依宁）

与美约会——我的俄罗斯文化情缘

刘畅*

与俄罗斯文化相遇，是近两年生命中的一场惊喜。怎么去定义我所知道的俄罗斯文化，一直成为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直到最近读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杰出的土耳其文学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写他所喜爱的德国作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时候，说到“本雅明的作品漫无边际、像碎片一样断断续续，正如生活本身。”^①于是，本着对生活和自己内心的尊重，帕慕克漫谈了自己年少时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纳博科夫的美妙经历，令人神往。这段阅读体验给了我灵感，于是我决定模仿本雅明和帕慕克，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通过文字聊一聊近两年我阅读和欣赏俄罗斯文化、艺术的感受。

早在来华师大之前就已耳闻贝文力老师“俄罗斯文化与艺术”的课如何火爆、如何生动、如何是一场文化与艺术的美的约会。于是在去年春季赴俄之前，旁听了一个学期贝老师对俄国文化生动的演绎，那是我第一次感性走入俄罗斯文化，自此之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名字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涅瓦大街、莫斯科河、阿尔巴特街、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也成为我经常浮想云游的地方。

俄国文化是什么，也许不同的教科书上都有自己的回答，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结合部文化，是几百年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西方主义互相攻讦、论争的双头鹰文化，是极端的美与感性的文化，是…但于我而言，她更是一个个具象的个体，从他们的作品，延伸到传记、电影、纪录片、甚至纪念碑、纪念邮票、明信片、文化轶事等我能涉及到的文化与艺术表现形式共同构成的文化气氛，这种文化气氛需要我通过阅读、观看、欣赏、游历去感受。所以俄罗斯文化、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浸润”的文化，是一场对我的审美的洗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向死而生”

* 刘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①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宗笑飞、林边水译：《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最开始接触俄国文化是从文学开始，最早在中学读过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到今天除了少有几段能够背诵的段落外，情节叙事大体已经忘了。大学里选修西方文学史，读木心先生的《文学回忆录》，光就俄国文学部分，木心先生用四章才讲完，就篇幅而言，比之其他国家都要多，可见俄国文学之皇皇。在璀璨星河中，第一个走进我内心的作家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第一次发现爱情或大海——它标志着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①对我而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浸受了一场成年礼，从那刻起，我开始学会隐藏天真。读的第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罪与罚》，记得是某年的寒假，冬天很冷，连续一周，我一个人蜷在家中向阳的房间读《罪与罚》，即使在中午太阳最暖的时候，我都能感到自己寒毛直竖，后来贝老师课上讲莫斯科就有以“罪与罚”为主题的地铁站，当时我就在想，要是一个人晚上行走在该站内，看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影像，想象着他杀害房东老太婆的场景，会亡命而奔吧。《罪与罚》是暗黑的、禁欲的，同时又将人性的乖张投放到最大，而他投射出来的正是俄国文化从被压抑到极致从而喷发，又寻求灵魂解脱的主题，是一种向死而生。此时我脑海中有一个场景刚好能契合这样的主题，南京五台山先锋书店正面墙上挂着一尊巨大的十字架，侧面墙上挂着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费奥多尔·米哈伊维奇侧对十字架，眉头紧锁，下颚低垂，双手紧握，十指交叉，浑身十分不自然的感觉，但即使这样，他依旧能沐浴在十字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渴求生活与光明的。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后，《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白夜》、《死屋手记》……引领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暗黑的时空，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个习惯，会用一段时间一气呵成地读完，让自己浸润到他的世界里，就在我快被窒息的时候，突然在罅隙里能够看到一丝光明，见到光的时刻欣喜又略带遗憾。但是说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好读，没有深厚的俄国思想和哲学基础，很难真正地去理解，比如《地下室手记》里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关于“宗教大法官”的阐述。所以纪德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随着我自身知识的积累，每个年龄段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触应该会不一样吧。但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生动地诠释了俄国文化的精髓，在文学里、在哲学里。

^①【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宗笑飞、林边水译：《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普希金的曼妙与豁达

贝老师课上提到最多的是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普希金作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阳光很多，更生活化，自带着俄式的粗犷与美丽。学期中，我专门用一段时间来读普希金，读《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别尔金小说集》，读他和丹特士决斗的篇章，以及贝老师对决斗文化的理解^①。特别记得，课上贝老师动情地说，“1837年2月10日下午1时40分许，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伟大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升天了”时候动人的场景，感受到贝老师对普希金，对俄国文化葆有的感情。普希金是细腻的，去年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前，我长久地驻足欣赏普希金与娜塔莎的雕像，对妻子的柔情，正如他爱情诗里的那般细腻而美妙，同时普希金也是豁达的，我曾多次走到上海汾阳路

^① 贝文力，《俄国社会文化图景上决斗影像的描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头的普希金纪念碑前驻足，普希金的昂首不畏风云气概正是俄国文化的大气。



托尔斯泰的“初见”

对于爱情的最美好的描写是在我看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我曾经借用纳兰容若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来描绘安娜与伏伦斯基从初见到相知到相爱到分手卧轨的过程，而我认为，文学史上能与红楼梦中宝黛初见的场景媲美的，就只有安娜与伏伦斯基伯爵初见的景象了。

“伏伦斯基跟着列车员登上车厢，在入口处站住了，给一位下车的夫人让路。伏伦斯基凭他丰富的社交经验，一眼就从这位太太的外表上看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他道歉了一声，正要走进车厢，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

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显出的一种异样亲切温柔的神态。他转过身去看她，她也向他回过头来。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接着又立刻转向走近来的人群，仿佛在找寻什么人。在这短促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从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她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①

所谓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大抵如此了。我不愿去描述后来他们爱情的苦痛，只愿永远保留他们初见时的一驻足，一回首。正如普希金在《致凯恩》里面写到的：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②

列夫·托尔斯泰对我而言，他的作品是俄国的，又不仅仅是俄国的。如果在普希金在俄国文化之路上愈穷愈远的话，那么托尔斯泰就是普遍主义的，他的爱、他的情怀是世界主义的，即使他骨子里流着斯拉夫的血液。

莱蒙托夫与诗邮寄

我读莱蒙托夫的作品不多，但是米佳^③却在关键的时候治愈了我，有一天晚上当我心情抑郁的时候，一位在哈萨克斯坦游学时认识的俄国姑娘丽萨给我寄来莱蒙托夫的《我独自一人走在大路上》：

我独自一人走到大路上，
一条石子路在雾中发亮。
夜很静。荒原面对着太空，
星星与星星互诉衷肠。
天空是多么庄严而神异！

①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版。

② 【俄罗斯】亚历山大·普希金著，高莽译，《普希金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③ 莱蒙托夫全名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米佳是对他的爱称。

大地在蓝蓝的光影中沉睡……
 我为何如此忧伤难受？
 我期待着什么？为什么而伤悲？
 我对于生活无所期待，
 对过去的岁月毫不后悔。
 我在寻求自由和宁静！
 我愿忘怀一切而入睡！
 但不是在阴冷的坟墓中长眠……
 我希望永远是这样的睡眠：
 要胸中保持着生命的活力，
 要呼吸均匀，气息和缓；
 要整日整夜能够听到
 悦耳的声音歌唱爱情，
 要使我头顶上茂盛的栎树
 随风摇动，终岁长青。^①

“诗邮寄”本来就是件很浪漫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插曲让我感受到了生活，俄国文化与我自己的生活与情感体验是有共鸣的，我想象着自己就是莱蒙托夫，我徘徊，我郁结，我欣喜，我释然……这点发现让我惊喜。



① 【俄罗斯】米哈伊尔·莱蒙托夫著，顾蕴璞译，《莱蒙托夫抒情诗全集（上下）》，江苏：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版。

艺术与文学的映照

随着对俄国文化的兴趣加深，我开始从其它艺术样式中找寻俄国文化的踪影。记得有次在艺海剧院看话剧，是孟京辉团队改编的白银时代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布尔加科夫，旋即被他的荒诞、戏谑同时严肃又深刻的魔幻现实主义所吸引，戏剧有一种“沉浸式”的代入感，当带有斯大林头像的巨幅幕布覆盖我全身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窒息感，和想要挣脱的欲望，那种欲望是非常原始又非常现实的。苏维埃文化中的那份禁锢感也体现在布尔加科夫其他作品中：《狗心》、《大师与玛格丽特》、《剧院情史》等，这也是俄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曾在上海大剧院看完莫斯科大剧院的《钦差大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完上话改编的《万尼亚舅舅》后，对批判现实主义产生兴趣，可怜等着乡下爷爷的万卡，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令人生厌的普利希别耶夫中士，甚至学着《打赌》里的律师“蔑视自由、生命和健康，以及你们的书里称为人间幸福的一切”^①。最近我还迷上了契诃夫的戏剧，常常拿来《樱桃园》或《三姊妹》的剧本来读，来演绎其中的角色，感受社会的世态炎凉，在戏剧的世界里，比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要来的更加真实，也更加淋漓尽致，嬉笑怒骂之后，更为引我入胜的是俄国文化中的反思精神，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永远在反思，永远通过戏虐的台词和夸张的表演体现出来，却入木三分。除了戏剧之外，我还曾走进东方艺术中心欣赏俄罗斯芭蕾《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精美的舞蹈吸引我更加深入地走近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去了解比如玛雅·普利西茨卡娅、嘉林娜·乌兰诺娃、瓦斯拉夫·尼金斯基、鲁道夫·努里耶夫、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谢尔盖·菲林这些优雅的舞蹈家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感受他们在舞台上和生活中的俄罗斯因素。亦曾去欣赏柴科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去感受每一份或辽阔或悲壮或细腻的俄罗斯气息。最吸引我的要数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每次音乐响起，脑海中必然浮现的是俄罗斯广袤的原野和《静静的顿河》里哥萨克齐刷刷割草的场景，久久挥之不去。无论是戏剧、舞蹈还是音乐，我的欣赏体验均在文学中得到映衬，可见俄

^① 万卡、普利西别耶夫、律师均为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参见：安东·契诃夫著，谷羽、童道明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1版。

罗斯文化之磅礴，之有趣。



后记

按照本雅明和帕慕克的做法，我已经漫无边际、碎片化地漫谈了我阅读、欣赏和感受到的俄罗斯文化，向死而生、照见生活、曼妙与豁达、充满反思意识、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其实我们可以完全省去这些概括，通过对其神韵的感受，去了解 and 欣赏俄罗斯文化。

（责任编辑：陆依宁）

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文森特的跨国道义价值观

李亨*

约翰·文森特是 20 世纪英国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其国际关系思想的立论基点是现代国际社会的“统一性”，并明显体现在他有关主权与人权的相互关系及有关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认识之中。他在 1968 年发表的《人权与国际关系》一书通过探讨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来阐述他对于人权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看法，并被视为他从多元主义转向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观的标志，发展了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

文森特将这本书分为三篇，分别讨论关于人权的理论、实践和政策。在第一部分的三章中，他分别介绍了人权的概念、人权思想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相对主义对人权思想的挑战。第二部分的三章分别探讨了东西方关系中的人权、南北方关系中的人权和当今世界社会中的人权，就人权思想在各国的差异和在世界上的普遍性进行了探究。最后一篇包括两章，反映了文森特对于人权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观点，并分析了人权思想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随后为美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文森特的跨国道义观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和最后两章。

1. 问题的引入：文化相对主义

文森特的人权观点的基础是针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质疑。文化相对主义是多元主义者所信奉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首先，道德法规因地而异；其次，理解道德法规必须将其置于其文化环境之中；最后，基于当地文化环境发展出的道德法规本身就是其有效性的根源。从这种视角来看，普遍性的人权思想只是一种被用来侵蚀其他社会文化个性的帝国主义手段，违背了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因此，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元文化，而普遍的价值观并不存在。文森特在书中列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者的一些论据，即非洲（重视集体权利）、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权理论的批判）和伊斯兰世界（重视宗教义务）关于人权的不同看法，这三个地区与国际法中普遍的人权思想产生了冲突。

对此，文森特认为，首先，世界文化的渗透已经模糊了各文化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相对主义那种因地制宜的原则就难以划界而发生了混

* 李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乱。其次，当人们为了理解道德规则而置身于这种文化环境中时，就难免发生对这种文化环境局限性的争论。最后，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对道德法规有效性根源的论述，从逻辑上看，由于不能说明各种文化是否平等，因此难以否认全球价值观的优越地位；而从道德角度来看，这完全排除了外界对某个社会的道德监督，为某些糟糕的社会提供了保护。因此，文森特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不能成为一种道德理论，相反“它可能抑制住了以往帝国主义的那种种族中心主义，但又强调各种文化应坚持自己的传统，并让这种种族主义到处迅速发展”（《人权与国际关系》，约翰·文森特，p77）。

为了解决以上的矛盾，文森特在书中列举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将人权作为具体权利来看待，它将人权与某个具体社会的价值观挂钩，但是文森特认为，这种方法“屈服于一种普遍化的特殊性。社会的人再次把人类的人排斥在外。”（《人权与国际关系》，约翰·文森特，p67）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第二种是将人权作为“核心”权利看待。文森特认为该方法与自然权利的传统是一致的，它要求寻找到一些所有文化都一致认同的核心权利，并将其作为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普遍性权利。第三种是把人权看作一种全球化中的权利。这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已经开启了世界社会的进程，人权是这个进程中的普遍标准。对此，文森特认为，尽管第三世界国家认为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应并强调国家的独立性，但这种用西方自决原则反对西方的现象表明世界共同文化确实获得了某种响应，这使得人权法可以在这个世界社会进程中被接受。

对于这三种方法，文森特提出：“我们必须承认人权的观念的确因文化而异，而且在决策时必须考察这种因素。问题是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坚持人因人的本性应享有人权，又承认这些权利的存在、内涵和重要意义是有争议的。”（《人权与国际关系》，约翰·文森特，p77-78）从这里可以看出，文森特对于文化相对主义人权观和普世主义人权观的态度已经比较明确了，那就是采取一条中间路线。

2. 主权与人权：对文森特基本理论的思考

(1) “基本权利”理论

文森特通过对人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探讨了主权和人权的关系。在第七章“人权和国际关系理论”中，文森特先比较了三种视角的人权观。首先是国家道德的角度。这种观点认为，国家不但能够担负道德责任，而且还是国际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所有个人和集体必须通过国家来进入

国际社会，因此必须遵循国与国之间的不干涉原则。持这种看法的人强烈地怀疑干涉者的动机和干涉的结果。首先，他们认为干涉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干涉者的利益而非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其次，干涉未必会引起好的结果。基于这种担忧，为了维持国际秩序与公正，国家之间不得不遵守不干涉的原则。对此，文森特评论道：“这一原则证明了最低纲领的团结：不是不承认道德，而是承认道德的局限性。”（《人权与国际关系》，约翰·文森特，p158）从这一点看，这种观点更看重秩序而非道德。

第二个是世界主义道德的角度。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的出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将扩大，因此人们的某些权利将被视为人本身的属性，而非归属于某种文化或集体。而目前的相互依存网络正在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为形成国际普遍的人权提供了条件。

第三个是将权利视作纯粹的利益。从这种视角出发，保守主义者认为道德本身体现为利益的合法化，并获得人们对这种利益的认可和支持。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认为权利是资产阶级用来蒙蔽大众的意识形态，通过大谈权利的普遍性来欺骗他们去追求资产阶级的目标。

文森特对这三种视角进行了批判和吸收。他认为，要否定国家道德中这种根本无视个人、集体与世界待遇的排他主义观念，而保留这种观点对国家地位认识的谨慎。对于世界主义道德观，他认为应拒绝那种对世界社会马上要实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保留对普遍道德的方向感。对于现实主义，要否定那种对就权利展开政治对话决绝的反对态度，而保留我们对任何普遍学说的怀疑精神。为此，文森特需要在主要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寻找能够被各国普遍接受的人权观念，所以提出了“基本权利”理论。他指出，基本权利就是生命权，即免受欺凌的安全权和生存权。他认为这是各国都必须承认的权利，“原因在于我们对人类生命价值所承担的义务，假使没有它，我们的日常工作会失去许多意义。如果这是对人类生命的义务，那么容许这一价值单纯由于（人类碰巧为相互抵御而修筑的）疆界而受到淡化是没有道理的。”（《人权与国际关系》，约翰·文森特，p175）而当谈到这种权利是否包含自由权时，文森特认为基本权利并不是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完整定义，而只是一个下限，在这个下限以上由各个社会来修正相应的道德准则。从这里可以看出，文森特只是将基本权利作为普遍性的道德准则，而力图在这个底线之上保持自己的中立性。

(2) 人权与合法性

另外，文森特还提出，基本权利在修正道德以外，还修正了国家合法性的观念。在这种理论下，国内合法性与其国际合法性是有联系的，国家的合法性并非仅仅在于它拥有主权，如果一国未能向公民提供基本权利，那么很有可能被认为是非法的（当然，还有可能是由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造成了这种情况）。对于这种人权观念可能会挑战主权的担心，文森特认为，人权只是要求各国国内制度的形式，类似于国际法原则下的国内法，属于国家控制的合法性的领域。同时，由于尊重人权能够增加这一体系的合法性，因此，它巩固了国家而非超越了国家。但这种合法性的观念使得国家不再能够将不干涉原则作为自己剥夺他人基本权利的护身符，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与国内人权的合法性产生了某种结合。

(3) 人道主义干涉

基于“基本权利”的理论，文森特还引出了人道主义干涉这项话题。为了弥补国家主义道德观和世界主义道德观的缺陷，他认为在当前主权国家依然是主要行为体的情况下，要保障人的普遍的基本权利，就需要一定的外界人道主义干涉。他说道：“人道主义干涉理论是：如果某个国家因其所作所为而激起人类良知的义愤，局外人即有责任做出反应。”（《人权与国际关系》，约翰·文森特，p175）当然，这种反应除了外界对某一国家所展开的干涉以外，为了避免剥夺他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还包括改变或者修正国际经济秩序。

联系到刚才提到的合法性，当一个国家因为无法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丧失了合法性之后，就不能以不干涉原则为基础的主权合法性来制止人道主义干涉。但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谨慎考虑，他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只能用于反对极端的压迫而非日常的压迫。因此，人道主义干涉仅是不干涉原则的一种例外，并没有否定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合法性。从这一点上来看，文森特是在寻求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的平衡点，力求在当前主权国家体系下向着普遍的正义原则努力。

3. 跨国道义价值观的代表：文森特人权思想的意义

首先，文森特关于人权和国际关系的思想是英国学派中关于跨国道义价值观的一个代表。这种讨论超越了英国学派中多元主义那种强调国际秩序，严格遵循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观点。与多元主义相比，文森特开始重视非国家的个人和集体的地位，他批判了文化相对主义，并且谨慎地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使得道德和伦理的色彩更加浓重。

其次，文森特的人权思想反映了一种在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之间的平衡。尽管文森特在一些观点上超越了多元主义，但这并不说明这种思想是完全的社会连带主义。文森特的思考仍然主要基于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并且明确提出，世界社会只是一种假设，它并没有出现。而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观点和“基本权利”理论也反映了他的谨慎，他仅仅强调，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干涉原则的一种例外，而基本权利则是刚刚突破了多元主义的底线（没有达到社会连带主义的标准）。

第三，文森特的“基本权利”理论对现实世界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在西方国家推行的自由民主的人权和发展中国家支持的自决权、发展权和集体人权的冲突之中，这种“基本权利”最有可能成为双方的共识，并成为世界普遍人权观的发展基点。文森特厌倦了东西方或者南北国家基于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和绝对的普世主义的争论，并寻求弥合两者的分歧，达成实质上的共识，这也是他对现实世界的一项很有意义的贡献。

最后，如同文森特在书中序言所说的那样：“本书并未要求摧毁目前的国际关系殿堂，以修建一座更适合人权发展的崭新的世界社会大厦，而是更倾向于探索如何用人权去修补国际社会的缝隙。”（《人权与国际关系》，约翰·文森特，序言,p3）这种思想似乎与英国学派那种介于国际体系和世界政府之间的国际社会观有着微妙的一致。两者都在寻求一种平衡，以求更加真实确切地描述当前的现实，同时又保留一种主观的期望，以求弥补现实的缺陷。

4. 仍然存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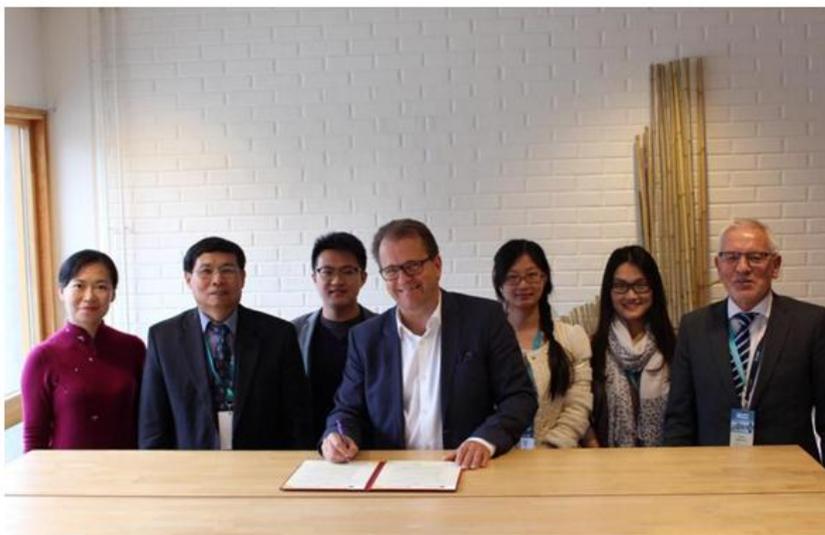
虽然文森特的人权思想已经在接近现实的道路上，但他的“基本权利”理论和人道主义干预观点依旧受到现实的制约。即使“基本权利”中的生存权和安全权基本成为了各国关于人权的共识，但是在现实层面上，无论出于利益还是文化相对性，各国在对这种基本权利的解释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异。近几年各国在联合国来关于叙利亚、朝鲜和非洲的人权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便是这种差异的反映，而随着这种争论，基于保护基本权利的人道主义干涉更是难以得到各国的一致认可。因此，国际关系中人权思想仍需要在争论中发展。

（责任编辑：陈子越、陆依宁）

国关要闻

我院师生应邀赴挪威参加“2016 北极会议”

5月25至26日，“2016 北极会议”（High North Dialogue 2016）在挪威诺尔兰郡首府博德市成功举办。本院潘兴明教授、陈静老师，与5位硕士研究生——史书怡、邵洁、Timothy Hughes（美国）、Nodirjon Boybirov（乌兹别克斯坦）和王韵涵等共同参加了该会议。



图为诺德大学（Nord University）校长签署协议。

潘兴明教授作为本次大会唯一受邀的中国学者在会上做主旨发言，并在闭幕式中做总结发言。同时，Timothy Hughes 和史书怡也在大会中呈现了精彩报告。会后，我院师生代表华东师范大学，见证了诺德大学校长亲笔签订了华东师范大学与诺德大学（Nord University）深化双方合作与学术交流的协议。



图为潘兴明教授在会中做主旨（左）和闭幕（右）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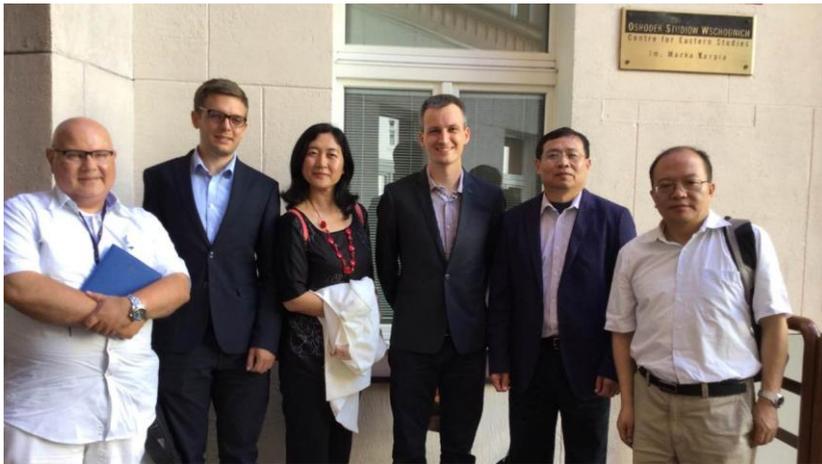
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在 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基地测评中获评“优秀”

2016 年 5 月 30 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公布 2015 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结果的通知》，我中心获评“优秀”。

据悉，2015 年教育部社科司委托南开大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依托“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系统”，在重点研究基地常态化监测和在线日常管理的基础上，依据“全面考察，突出质量和贡献导向；以客观评价为主，主客观评价相结合；分类评价，鼓励特色发展”的原则，对全国 151 所重点研究基地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0 日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咨政服务、学术交流、资料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测评。在本次测评中有 30 个基地被评为“优秀”，我中心名列其中。在“港澳台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片的 13 个基地中，我中心在标志性、代表性成果方面取得排名第一的佳绩。

我院学者前往中东欧三国进行学术交流

2016年6月27日至7月6日，我院欧洲研究中心潘兴明教授、高晓川博士和臧术美博士一行访问了中东欧三国，先后与捷克国际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查理大学 CERGE-EI 研究中心、波兰东方研究中心（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以及匈牙利最大的智库 Antall Jozsef Knowledge Center。此次访问主要就英国脱欧与欧盟前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竞争与合作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四个受访机构都对我院代表团进行了热诚的欢迎和接待，并表达了与我院和我校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



俄罗斯研究中心召开“十三五”建设工作会议

7月15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理科大楼404会议室顺利召开了俄罗斯研究中心“十三五”建设思路与举措的工作会议。

会议由上海市社科院伍贻康教授主持，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院李新研究员、上海市社科院余建华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潘大渭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范军教授、刘军教授和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部分教师参加会议。受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委托，首先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就俄罗斯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组织的2015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中获得“优秀”及相关情况进行通报，随后，俄罗斯研究中心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订和完善了“十三五”发展规划。在听取俄罗斯研究中心“十三五”规划的建设思路与具体措施，包括目标定位、重大任务、科研项目规划等内容汇报之后，与会专家对俄中心制定的“十三五”建设思路和举措给予了积极评价，并且对基地重大项目的论证报告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The 10th annual China Goes Glob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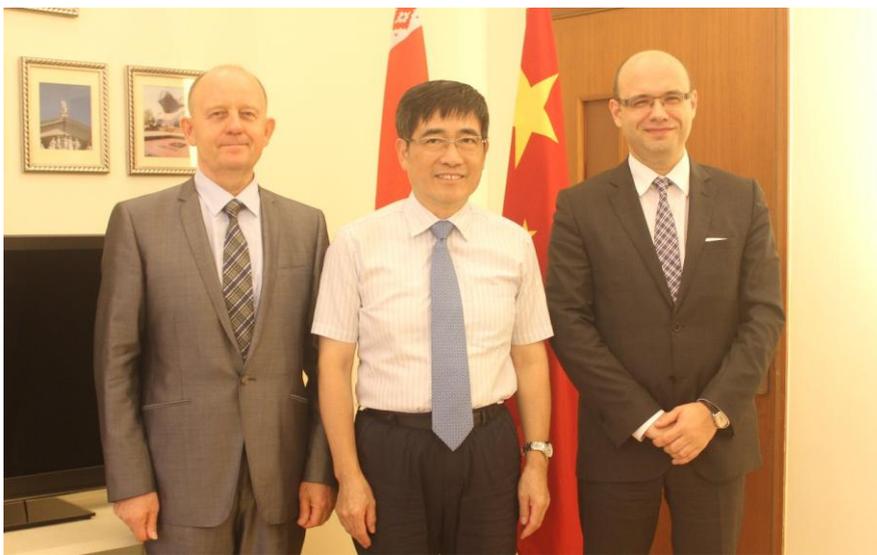
2016年7月下旬，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白永辉教授出席了“中国走向全球化”第十届国际学术会议，该年会在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举行。会议上，白教授提交了一篇论文(与 Francesca Spigarelli 教授合写)，题为《关于中国与双边投资协定 (BITs) 的思考：细节/发展、争议与研究方向》。在演讲中，白教授和 Spigarelli 教授讨论了中国使用 BITs 的历史，中国对 BITs 立场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欧盟 (EU) 和美国 (US) 的 BITs 谈判。白教授和 Spigarelli 教授也从地理和条约条款角度讨论了 BITs 的历史、目的和模式。此外，他们也回顾了 BITs 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文献。他们的论文提供了一个评价 BITs 的投资者友好程度的有创意的方案，显示了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需求的变化，中国对 BITs 的要求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并表明了中国并不反对使用国际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总之，他们的研究表明，中美和中欧成功实现投资协定谈判仍然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白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鲁德访问我校

8月13日，白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基里尔·鲁德访问我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在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会见了白俄罗斯客人。童世骏向客人介绍了学校的概况和在国际化、跨学科建设过程中与白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交流合作的情况，表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校将继续发挥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优势，对接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发展上合组织等战略需求，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与白俄罗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并以此为中白人文交流做出新的贡献。

鲁德对我校与白高校交流合作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与童世骏就联合培养、合作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会谈后，童世骏和鲁德还看望了来我校参加第七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的白俄罗斯学生，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国际交流处副主任黄志华、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贝文力和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瓦列里·马采利、领事德米特里·科兹洛夫斯基、白大使助理帕维尔·伊瓦先科参加了上述活动。

我校是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教育分委会的中方合作单位。目前，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等白主要高校间在学生互换、联合培养等方面保持着常态化的务实有效的合作关系，并计划与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合作设立中国语言文化系。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柯尔德教授到访俄中心 并作演讲



2016年9月23日上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柯尔德教授到访俄中心并作演讲，演讲题目为“新大陆主义：概念与研究方法”，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出席并主持本次讲座。

柯尔德教授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主要的著作包括《美国、日本和海湾》（2015年8月）、《在华盛顿内部的亚洲》（2014），以及《新大陆主义：能源与二十一世纪的欧亚地缘政治》（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

柯尔德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何时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新的作用、如何发挥新的作用，这对国际秩序本身有何意义。柯尔德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他提出了“新大陆主义”，并详细勾勒除了欧亚大陆政治经济结构性专线，以及这些结构性转变与欧亚大陆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柯尔德教授的新大陆主义思想、理念和著作，有助于读者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国际事务中将会产生长期而广泛的战略影响

百名各国学者共同探讨大欧亚的新机遇

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在校召开

9月24-25日，由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七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在我校中山北路校区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大欧亚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来自中、日、韩、俄、印、美、英、德、哈、蒙等16个国家的160余位学者参会，开幕式由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主持。

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为大会发来贺信。他在贺信中指出，在历史长河中，欧亚大陆始终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欧亚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显著上升。面向未来，这块大陆东、中、西部的合作前景更给世人带来无尽的想象空间。世界上高度重视这一大陆板块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俄美欧等主要大国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地区合作倡议。戴秉国特别强调，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开放包容、信任合作、不断创新的欧亚大陆符合这块大陆上每一个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开幕式现场



上海合作组织首任秘书长、中国驻俄罗斯前大使张德广应邀为大会作主旨演讲



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主席 Georges Mink 教授为大会致辞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开幕式



我校副校长周傲英为大会致辞

我院汪诗明教授参加“第二届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并做大会主旨报告

“第二届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于2016年9月26-27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徽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聊城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太平洋岛国论坛投资与贸易专员署的官员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记者近70人参加了论坛。



我院汪诗明教授参加“第二届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并做大会主旨报告

开幕式后，大会安排三位主旨报告人。外交部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会长杜起文先生做了题为《关于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和中太关系的几点看法》的主旨报告；我院汪诗明教授做了题为《国内太平洋岛屿国家研究趋势前瞻》的主旨报告；山东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刘昌明教授做了题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战略对接：动因、挑战与对策》的主旨报告。

2016 年北方航道七国国际会议在我院成功举行

9 月 27 日至 28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主办的“2016 年北方航道七国国际会议”在上海隆重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欧亚大陆与亚太地区的先进经济合作形式以及其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发展的影响。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挪威和德国七国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的 30 多位学者专家参与讨论。大会开幕式由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志斌致辞

我校副校长李志斌在致辞中指出，华东师大在国际关系学科以及俄罗斯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积累，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俄罗斯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当前形势下，本次会议主题恰当地把握了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演进趋势，也体现出相关国家当前关切和发展方向。相信与会专家学者一定会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交流科研心得，探讨合作契机，建立健康、良好而稳定的学术交流机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致辞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致辞中表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于 2013 年启动“国际合作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国际学术项目，

闻道

这一项目旨在通过学术交流认识和理解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发展的条件和潜力，帮助推动和实现国际合作。目前，该项目已经成为了讨论俄罗斯亚洲战略、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北方航道国际合作等问题，涵盖新加坡、日本、韩国、挪威、俄罗斯、美国、中国等七国的重要国际性学术共同体。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致辞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开幕式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A. Karaganov）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自 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以来，“转向东方”以及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政治和学术精英越来越意识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全面合作对于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大会开幕式由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

本次大会共有六项议题，分别是多极化不断加强背景下，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发的国际合作；俄罗斯经济融入亚太及其对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的影响；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以及在大欧亚的合作：新的运输路线、物流和共同发展；进一步开发的经济手段：针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世界经验以及教训；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的部门优先设置；自然资源、环境、金融行业作为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的驱动力。

会议各项议题讨论中，卡拉加诺夫教授面对国际秩序新常态，认为中俄应积极开展合作，以上合组织为核心，依托“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制定“大欧亚计划”。未来工学研究所研究员小泉悠（Yuu Koizumi）谈到俄罗斯重视远东地区与其军事安排有密切关系，苏联解体

闻道

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富山大学远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堀江典生（Norion Horie）教授谈及在远东的俄罗斯人对参与远东经济开发的中国劳动力存有偏见，两国民众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和沟通，两国在高层交流、经济合作和国际协作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还应重视文化交流。



来自北方航道七国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的 30 多位学者专家参与讨论

张学良先生侄孙李大壮先生与我院师生畅谈

两岸交流合作

10月14日下午，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主席、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先生侄孙李大壮先生在理科大楼 A508 室做了题为《寻找共同语言——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的讲座。讲座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主持。来自国关院与其他院系的师生共 50 余人聆听了讲座。



讲座开始前陈群校长等与李大壮先生合影



讲座中的李大壮先生

李大壮先生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围绕“我与台湾的缘”、“台湾问题”、“寻找共同语言”、“与台湾朋友的交往之道”四个话题，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两岸四地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李先生在讲座中既表达了对两岸关系的担忧，也提出了耐心、平常心、爱心、诚意、情意的交友之道，并提出了对年轻一代的希望和嘱托。

汪诗明教授参加“英联邦国家与海洋文明”国际 学术研讨会

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英联邦国家与海洋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15—17日在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计8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我院汪诗明教授做了题为“澳大利亚历史界分与历史叙事”的大会发言。汪教授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学术界尤其是澳大利亚学界没有对澳大利亚历史进程进行分期的原因，认为是种族主义史学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其次，汪教授着重谈了他本人对澳大利亚历史分期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原住民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民族”，是澳洲历史的最先创造者。即便在殖民入侵之后，澳洲的原住民并没有像白人所预料或期盼的那样将从地球上绝迹，也没有出现原住民逆转白人主导历史进程的现象或趋势。这就出现了澳洲的历史由白人主宰而黑人以一种依附兼而反抗与和解的方式在延续自己历史的并存现象。如今的澳大利亚已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汪教授认为，如果以广义上的澳大利亚民族或国家属性的建构为考察线索，将澳大利亚历史划分成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原住民时期（?～1788）殖民时期（1788～1901）和白澳政策时期（1901～1972）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时期（1972～），澳大利亚历史的演进态势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而历史叙事就少些主观色彩。

刘军教授参加北大国关 20 周年院庆及全国国际 学院院长论坛



2016 年 11 月 3 日上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 20 周年暨建系 56 周年庆祝大会在学院秋林报告厅顺利举行。前国务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戴秉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前文化部部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会长蔡武，意大利前总理、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巴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恩里克·莱塔，蒙古国前总理阿马尔扎尔嘎勒·林钦尼亚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李亚飞，中央外办前副主任、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吕凤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党总支书记、北京市委统战部原部长沈仁道，全国工商联第十届副主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常务副会长沈建国，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以及来自全国政协、教育部、兄弟院校和北京大学的领导、嘉宾、中外学者以及历届院友代表共同参加庆祝大会，大会由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李寒梅主持。

从 G20 看全球治理新态势

冯绍雷教授终身教授报告会举行

11月4日下午，我院冯绍雷教授的终身教授报告会在理科大楼 A510 室成功举行。讲座的主题是“从 G20 看全球治理的新态势”，全院师生代表和其他学院学生代表共 60 余人聆听了报告。





冯绍雷教授谈到，第一，从历史上看，全球治理这一概念产生于冷战之后，它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关的范畴。全球治理的特征表现为，它是一种非政府行为，但同时，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治理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过程构成，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即包含了正式制度安排又包含非正式制度安排。近来最显著的态势是，全球治理正在从由西方主导逐渐向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格局转变。全球治理强调参与、谈判和协调，讲究互动与“共同发展”。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冷战结束之后，各大国之间相互合作与博弈，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关键的转折点，全球治理逐渐趋向多元化与多样化。第二，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角度来看，随着排他性的区域治理结构的建立，全球化的进程面临阻碍。历次国际次序的大变动推动了全球治理方式的转变，而未来的全球治理趋势将会是由各国的互相竞争与合作交替推动的，是多样化与普世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交织。第三，中国应当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应该坚持“三位一体”，从实力、规范和文化三方面努力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提高综合国力的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和制度规范的安排，文化上要注意主体性构建，突出民族特色又要具有国际范。另外，此次的杭州峰会中也凸显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一起参与治理的重要性。



上海社科院伍贻康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并介绍了 G20 内部的协调情况





在座师生与冯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同学们表示收获很大，对杭州峰会的成果以及全球治理这一复杂的、处于动态过程中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举行学术讲座



11月18日下午,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的专题讲座在理科大楼A510成功举行。讲座的主题是“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与对华参与政策的反应”,全院师生代表和其他学院学生代表聆听了报告。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白永辉主持。

赵教授在讲座中谈到,经历了对外战争、经济危机、种族隔阂等负面影响,美国已无心与中国对抗,在这种境遇下,美方认同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伙伴关系中的“不冲突、不对抗”理念。虽然,双方对此关系的理解和期待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共识还是中美之间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

在座师生与赵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同学们表示收获很大,对中美关系——这一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总体走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我院承办召开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第八届青年学术论坛

11月18日，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我院承办的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八届青年学术论坛、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在我校成功举行。

上午9点，第八届青年学术论坛在理科大楼207室举办，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欧亚大陆的发展：经济共赢、交通互联、文化共存”。论坛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范军教授先后致辞。11月上旬学会组织常务理事、会长、副秘书长等专家学者对投稿论文进行了评审，最终评选出教师组、研究生组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学术奖等奖项。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博士后万青松获得教师组优秀论文一等奖，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李奇璘、刘景卿获得研究生组优秀论文一等奖，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分获二、三等奖。论坛上，青年学者、青年学生分别宣读了获奖论文。张健荣研究员、范军教授、贝文力教授分别对论文进行了点评。会后，学会领导为优秀论文获得者颁奖。

下午1点30分，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在理科大楼508室举行。今年的年会主题为“大欧亚联通与发展中的俄罗斯方案和角色定位”。会议由杨焯教授主持，上海市社联学会管理处处长梁玉国、刘军教授、范军教授先后致辞。会议上半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王海燕副教授、上海合作组织与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张丹华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与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博士先后做主旨发言。下半场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主持，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唐朱昌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毕洪业副教授做主旨发言。主旨报告后，专家学者进行了自由发言和讨论，范军教授做了会议总结。

“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学”

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6年11月19-20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研究中心与美国黄氏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于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议有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数十位学者参加。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汪荣明教授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汪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正需要我们学者本着理性、开放、多元的态度，积极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为实现东南亚地区、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白永辉博士也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前马来西亚大使王春贵先生出席开幕式并做主旨演讲：“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战略合作。王大使认为，过去的25年，是中国—东盟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的25年，也是中国—东盟务实合作硕果累累的25年。

展望未来，中国—东盟关系前景广阔。中方始终视东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区域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将继续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继续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知名的亚太问题专家、美国“中美关系国家委员会”的成员、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也做了一个主旨演讲：“规则接受者，规则制定者还是规则破坏者：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赵教授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现有世界秩序的“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规则破坏者（rule-breaker），而是一个“改革派的”（reformist/revisionist）国际力量。中国所不满的，不是现有世界秩序，而是其在现有秩序中的位置。中国距离赶超美国还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也尚未构建起改写（underwrite）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随着中国实力和声音的不断提升，如果现有的或者调整后的国际规则能够更好地适应它的需求，中国则没有必要走向一个革命性的规则破坏者（rule-breaker）的角色。

会议致力于考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主要分为三个大的板块展开详细的研讨：第一板块探讨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刘卿博士认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前景光明，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领土争端问题，不平衡的经济关系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等。第二个板块探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的回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陈绍峰博士认为，总体上说，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持欢迎态度，希望这一倡议能够跟他们国内的发展计划以及整个东盟的联通发展对接起来。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中国“战略”意图有所担忧。马来西亚的学者 Hee Kong YONG 教授和美国学者 Mohan Malik 分别探讨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以及马来西亚和缅甸对该倡议的反响。第三个板块探讨的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特大区域行为体（Extra-regional Players）以及经济议题。学者们详细探讨了“中、美、印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背景下的香港”等议题。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 Sumit Ganguly 教授详细探讨了印度的“东向政策”（India's Look East Policy）的演变及其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Sumit Ganguly 教授指出，在过去的 25 年间，印度东向

政策在处理印度与东南亚国家间的经济、政治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乃至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印度东向政策的军事向度的关切有所提升。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对中国在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的长期战略意图心存疑虑。与会学者们就“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的重要议题开展了充分的、全方位的交流和研讨，得到了与会各方的高度肯定。

张红博士应邀出席“2016年的俄罗斯：大国战略的回归”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24日，由知名智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与法国国防部联合主办的主题为“2016年的俄罗斯：大国战略的回归（Russia 2016: Return of Great Power Strategy）”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法国巴黎召开。来自法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等国家的60余位中外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我院张红博士应邀在本次会议小组做了主题为“北京视角：中俄关系是否脆弱联姻？（Beijing's View: I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a Paper Marriage?）”的发言。张博士主要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中俄关系性质的五种不同认知，中俄在区域战略构想和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方面的对接和协作，以及两国协调共同应对重大国际危机的相似立场等三方面内容。同时，她还指出了当前中俄在全球、区域及双边层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最后强调了中俄关系是一种更趋完善的现代化伙伴关系，旨在解决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相似问题，以及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共同维护有利于各自发展的良好环境。迄今为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携手走过“瓷婚”，面对两国内外进程的相似性，中俄需要相互倚重，共同发掘更多相互共赢的潜能。

中挪俄三方工作会议在我院举行



12月6日，挪威诺德大学高北研究中心主任 Frode Mellemvik 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项目官员 Lada Ivanova 女士一行 5 人访问我院，并举行了第二次“中挪俄三方联合培养项目”工作会议。我院院长刘军教授，院长助理张昕博士，以及负责国际学术交流的办公室主任陈静参加了此次会议。

去年我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潘兴明教授带队赴挪威参加“2015 高北对话”，同时与挪威高北中心国际项目团队进行了第一次“中挪俄三方联合培养项目”工作会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此次工作会议是在第一次工作会议基础上，就有关细节商谈，力争有实质性推进。

在为期一天的工作会议上，三方就联合培养模式、联合学位授予、三方课程设置、科研合作以及项目资助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拟定在 2018 年正式招收第一批联合培养学员。未来的中挪俄联合培养硕士将有机会在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挪威博多诺德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各进行一个学期的学习，达到学分要求，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后，有望获得三方联合培养硕士学位。该项目的推进与实施，将为我院国际化合作与人才培养开启新的合作渠道。

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三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

正式开幕

2016年12月8日上午，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三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于我校理科大楼404会议室正式开幕，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院长助理张昕老师主持开幕式并担任开场讲座主讲人，共有来自俄罗斯、美国、中国等多个国家的15名学员出席本次开幕式。

刘军教授在致辞中指出，2016年正值中俄建交25周年，作为国内前苏联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重镇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的理念旨在鼓励各国青年学者交流学术成果，培养亚欧外交领域的未来精英以及通过人文及教育交流促进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同时，围绕本届精英讲习班“转型25周年”的主题，刘军教授呼吁学员通过比较与总结中俄转型经验，积极思考中俄两国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应当扮演的角色。

继前两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全面审视了“欧亚空间”、“欧亚主义”等概念的历史、文化与当代政策含义之后，本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将聚焦苏联解体25年以来在前东方阵营内部的转型表现和多样性。在接下来的6天内，来自中国、俄罗斯、欧洲的资深学者及专家将与多国青年学术精英围绕讲习班主题展开多层次、多学科的讨论交流。来自俄罗斯、挪威及国内复旦大学、外交学院等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为本次中俄精英班授课。



张昕老师主持开幕式



刘军教授致辞

(责任编辑：刘一鸣、陆依宁)



《闻道》征稿启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我们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人与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征稿栏目主要有国际问题研究、学术随笔（含书评）以及文艺专栏等。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刊登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来稿字数在10000字左右为宜。学术思想随笔（含书评）主要刊登古今中西经典著作阅读、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文章，3000-6000字为宜。文艺专栏主要刊登文化艺术类题材随笔，如文学、电影、音乐、戏曲、旅游、时尚等，2000-5000字为宜。

来稿时敬请作者注意：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属于内部发行，不影响投稿之后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
2. 来稿需为word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可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3. 投稿作者同时需要提供200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通信地址、电话等），以便于后期邮寄期刊和支付稿酬。
4. 本刊对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评审意见会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作者。我们会在2个月之内给来稿作者以回复。
5. 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本刊对决定刊登的稿件可作必要的修改，不同意修改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6.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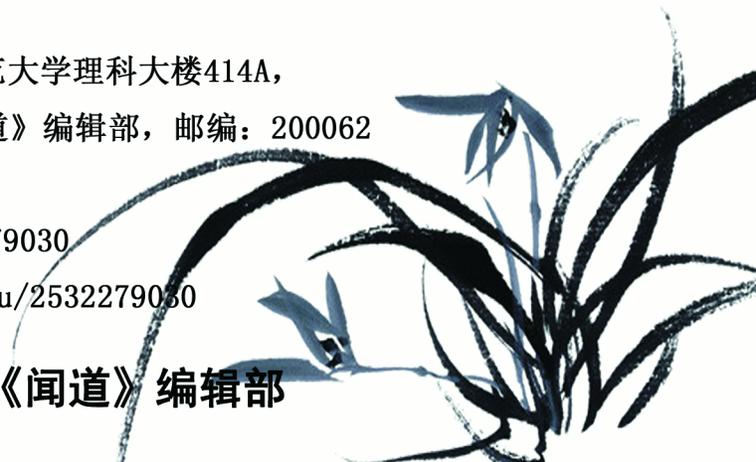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414A，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邮编：200062

网站：<http://www.saias.ecnu.edu.c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532279030>

新浪微博：闻道杂志社，<http://weibo.com/u/2532279030>



《闻道》编辑部



S A I A 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